

中国
工农红军

第二十六军战史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 编



白山出版社

继承前事传统
永垂不朽

孙秀山

1994.7.30

永葆光輝
再建奇功

王世泰

一九四四年
四月二十四日

发扬红军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吴德峰书

一九四一年
五月廿五日



谢子长像



刘志丹像



1932年11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会场



△1993年12月15日，张竭诚等老红军在沈阳讨论红二十六军战史送审稿时合影。
右起：张午、贺吉祥、杨士梅、石硕、张竭诚、曹子平、张德胜。



△1994年3月17日，王世泰老首长在兰州与红二十六军战史编写人员合影。

△ 1994年7月，美國軍情參謀處二十六名成員



号 11 字登薄(五)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战 史

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

白山出版社

1994. 7 • 沈阳



(辽)新登字 1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编
—沈阳:白山出版社,1994.10
ISBN7-80566-405-6

I. 中… II. 陆… III. 陕北红军—军队史 IV.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11755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110013
七二一二工厂胶版印刷

开本:787×1092 1/20 6.8 印张 86 千字 插页 8
1994 年 11 月第一版 1994 年 11 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孙丕安 责任校对:刘仲宁
封面设计:白 泉
印数 1—1000

ISBN7-80566-405-6/E·57

定价:29.00 元

(内部发行)

(86) 臥裏劍大氣團內 “離間”入庭判書 章二第
為二章前臥裏劍止判、判對族人始何等 奇一第

(88) **目 录** “離間”
“離間”臥裏三條臥裏劍止判、判對族人 章二第

(89) 臥裏三條臥裏劍止判、判對族人 章二第

- 1 -

第五章 粉碎敌人“围剿” 巩固扩大根据地 (66)

第一节 粉碎敌人对陕甘、陕北根据地的第二次
“围剿” (66)

第二节 参加陕甘、陕北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
斗争 (76)

结束语 (8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大事记 (95)

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之一 (118)

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之二 (119)

后记 (120)

附图:

- (81) 1.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照金根据地
(81) 活动及南下终南山行动路线图 章二第
- (82) 2. 1933年照金革命根据地略图 章二第
- (82) 3.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分布图 章二第
- (82) 4. 陕甘边、陕北苏区红军反“围剿”经过
(82) 要图 章三第
- (82) 5. 西北红军反“围剿”经过要图 章四第
- (82) 6.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发展序列沿革表
(82) 章三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82) 章四第

序 言

编写红二十六军战史是我的长期心愿。现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一书和我们见面了,我作为红二十六军的一名老战士,为此感到十分欣慰!向关心红二十六军战史的老同志、向组织编写战史的第三十九集团军党委和参加编写工作的所有同志致谢!

我与红二十六军有着深厚的感情,这不仅因为我曾任过这个军四十二师的政委,指挥过这支部队,还因为我非常熟悉这支部队的主要创建人和指挥者——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在那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中,我们曾出生入死,并肩战斗,彼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始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活动在祖国大西北地区的一支主力红军,是第三十九集团军前身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二十六军的诞生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产物,她的成长,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27年10月,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陕西清涧起义爆发,揭开了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序幕。此后,陕西、甘肃又相继爆发了渭(南)华(县)、旬邑、两当、靖远等数次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唤醒了陕甘地区人民的革命觉悟,培养锻炼了一大批武装斗争的骨干,积累了武装

斗争的经验，为后来组建红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1年9月，南梁游击队正式成立。同年10月，由中共山西省委组建的晋西游击队入陕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向中央报告了游击队的发展情况，并请求给予红军番号，建立正式红军。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致信陕西省委，同意建立正式红军，并给予正式红军番号：“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辖红二团。这是我党在西北组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1933年5月29日，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南）华（县）开辟游击新区，遭到国民党军队重兵“围剿”，致使南下失利。

为了牢固树立起红二十六军这面战斗旗帜，1933年7月21日，陕西省委组织发动了驻耀县杨虎城部骑兵团起义，并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8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团。1933年11月，成立了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下辖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红四团）。至1934年11月，又相继成立了红一团、红二团、红三团、骑兵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全军发展到1500余人。

1935年9月，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六军从诞生到编入红十五军团，独立奋斗两年零九个月。在两年零九个月时间中，红二十六军历经大小战斗500余次，毙伤俘敌1万余人，缴长短枪6000余支、轻重机枪150余挺、迫击炮18门，击落敌机1架，以小的代价换取

了大的胜利。在两年零九个月时间中，红二十六军广大官兵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率领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持以革命武装反对反革命武装，坚持从实际出发发展革命力量，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多次干扰，逐步发展成为一支西北的主力红军，会同红二十七军创建了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可靠的立足点。红二十六军的光辉战斗历程，不可磨灭的革命业绩，将永载史册。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是一部军事斗争史；也是一部难得的历史传统教材。该书内容翔实，文字简练，语言流畅，具有一定可读性。它对研究西北党史、军史、军事斗争史和进行文学创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深信广大读者必将从此书中受到教育和启迪。我衷心祝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一书的问世，并愿为该书作序。

第一节 组织发动

陈秀山

1994.7.3

1927年2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指出“军事工作极端重要”，会议指出了“在西北形成革命的新局面……这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发出了“武装农民”、“建立革命军队”的号召，提出了“组织革命武装，组织农民革命军，建立党的军事干部，迅速充实革命军队，并在农村发展党，组织农民”的要求。1929年5月28日，中央通过的《陕甘两省决议案》中指出，陕甘党目前的斗争任务是“组织

第一章 积极开展兵运 创建革命武装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镇压革命势力，大批的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惨遭杀害，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吓不倒中国共产党人，敌人的镇压激起了人民群众更大的反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震撼着中华大地。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全国各地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将斗争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和国民党军队中，各级党组织积极开展“农运”、“兵运”工作，发动“兵暴”组织革命的武装力量。陕甘边地区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起来。

第一节 组织发动武装起义和革命兵暴

1927 年 9 月 26 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会议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强调了加强军事工作的重要性。会议指出了“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发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去”的号召，提出了掌握武装力量，组织发动革命的兵变，培养党的军事干部，组建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并在农村发展党、团组织的要求。1929 年 6 月 22 日，中央通过的《陕西问题决议案》中指出，陕甘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

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汇合起来”。“同时可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如民团、红枪会、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深入一切反革命军队士兵群众中去，使他们从日常斗争中接受我们的政治影响，组成党的士兵支部，以备成为武装暴动中的主要力量之一。”根据这些精神，谢子长、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员，受中共陕西省委的派遣，到陕甘边一带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发展革命武装。之后，陕甘边的革命武装起义和兵暴便迅猛地爆发起来。

1927年10月12日，共产党员唐谢、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驻陕北清涧的国民党井岳秀部石谦旅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这次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惊慌失措，急忙调集重兵围剿起义部队，部队被迫转移到韩城。1928年7月12日，起义部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议，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唐谢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游击队编为四个分队，共计200余人。改编后部队北上，攻打宜川受挫，转移途中又遭敌袭击，起义最后失败。1928年2月29日，陕西渭南发动了由我党领导的数百名农民和学生反抗反动豪绅强占宜化高小的斗争。1928年3月13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由陕东的部分暴动引起全陕的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1928年5月1日至4日，渭南、华县几个集镇分别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5月10日，在陕军李虎臣部任旅长的中共党员许权中率部在华县瓜坡镇宣布

起义。5月16日，起义部队在高塘与暴动农民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会上宣布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命令，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军委下设总司令部，总司令唐澍，政委刘继曾，总参谋长王泰吉，参谋主任高克林，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全军共1000余人，五六百支枪，编成4个大队，1个赤卫大队和1个骑兵分队。一大队长赵雅生，二大队长谢子长（兼），三大队（虚设），四大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长张汉泉，骑兵分队长许权中（兼）。西北工农革命军在渭华一带坚持斗争近2个月，对敌产生威胁。不久，军阀冯玉祥调集3个师围剿起义部队，终因敌强我弱而于8月上旬宣告失败。

1928年春，陕西旬邑县党组织根据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的总暴动”的通告精神，积极开展革命斗争，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5月6日，共产党员许才升召集清水塬等地农民140多人，以抗粮“交农”为口号发动了起义。起义群众手持各种农具和梭镖、大刀、长矛等武器，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沿途群众积极响应，队伍扩大到400多人。5月7日拂晓，起义队伍攻入县城。攻占了粮食局和县政府，镇压了县长李克宣，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捕党员和大批群众，广大群众扬眉吐气，拍手称快。5月12日，起义队伍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政府主席，程水盛任红军总指挥。此后，许才升率部活动于张家村、那坡子、马家堡、底庙、职田、土桥、张洪镇等地开展革命斗争，并迅速影响到彬县、淳化、永寿以及甘肃的宁县、灵台等县。旬邑起义的影响日益

扩大，国民党政府惊恐不安。一面指使反动豪绅暗中收买瓦解起义队伍，一面派民团围攻旬邑县城。5月30日，县城重新落入敌手，苏维埃政府领导人被捕。31日，许才升、程永盛等七位领导人惨遭杀害。

在党的领导下，清涧、渭华、旬邑三次起义虽然最后都失败了，但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创建革命武装斗争的序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唤醒了陕甘人民革命斗争的觉悟，培养了我党进行武装革命的军事骨干，保留了革命武装的星星之火，为后来陕甘地区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清算了陈独秀右倾错误，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会议认为，当前全国的形势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10月8日，中央致信于陕西省委指出：“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此后，中共陕西省委把开展兵运工作，瓦解敌人，发动革命兵暴，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并把兵运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陕甘边地区。同时派谢子长、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春，刘志丹回到保安县（今志丹县）与地下党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一起发动群众，与保安县民团开展斗争，一举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刘志丹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并相机安插了部分党员，掌握了该民团的部分武装。

1930年春，驻守宁夏的军阀苏雨生乘蒋、冯、阎大战之机扩军，谢子长、刘志丹迅速带领一批共产党员打入苏雨生

部。谢子长被苏雨生任命为第十旅旅长，刘志丹被任命为第八旅十六团副团长。为了提高部队中党团员的军事素质，谢子长、刘志丹组织成立了学兵队，张东蛟任队长，高岗任政委。不久，苏雨生在地方军阀混战中兵败，离开宁夏。谢子长、刘志丹立即将学兵队安插到国民党王子元部，继续开展兵运工作。然后，带部分同志返回陕北。

此时，甘肃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为了扩大实力，到处招兵买马。刘志丹闻讯后，毅然奔赴谭部挂名建军，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被谭任命为骑兵第六营营长，活动于甘肃庆阳县三道川（今属陕西吴旗县）一带。同时，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雷恩钧等军事骨干前往陕西宜川县后九天杨庚武部，开展兵运工作。不久将杨部周维琪营拉出，在三道川与刘志丹第六营会合，扩编为谭部一个团。谢子长、刘志丹分别任正副团长。在准备兵变的关键时刻，周维琪被谭部张廷芝收买，合谋袭击了谢、刘的队伍。谢子长、刘志丹虽然脱险，但组建起来的队伍却被打散。

1930年8月，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主动辞去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陕甘边的武装斗争。三道川事件之后，刘志丹从兵运工作失败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深刻地认识到：“要建一支真正的革命武装，不能只利用现成的旧军队，利用军阀只能是暂时的，应该准备条件自己独立去干”。9月，刘志丹回到保安县永宁山，与曹力如（时任永宁山民团团总）等制订了独立组建革命武装的计划。与此同时得到情报，军阀谭世麟仍望刘志丹去任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之职。并命令驻合水县太白镇陇东民团军二十四营营副尽力协助。据此，刘志丹与永宁山党

组织反复研究，决定趁此机会收缴二十四营的枪械。消灭这股反动民团，组建革命的武装。10月1日，刘志丹在保安县地下党的帮助下，带领四五十人，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袭击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击毙敌正副营长，缴获长短枪50余支、骡马10余匹。在此基础上，组织起来一支革命武装，不久这支队伍发展到150余人。此后，这支革命武装在安塞、保安、合水、庆阳等地开展游击活动，消灭了反动民团和土豪，扩大了革命武装的政治影响，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前来参加革命武装。由于队伍活动频繁，声势渐大，引起了国民党军队的注意，陕北军阀井岳秀令高双城部前来“围剿”。1931年2月中旬，为摆脱敌重兵“围剿”，刘志丹率部向甘肃陇东一带转移，一路上积极宣传我军政策，使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三股绿林武装300余人投身革命。刘志丹率部进至合水县固城川麻义村进行了整编。整编后，刘志丹任总指挥，率部向南进军，在甘肃宁县张皮塬遭军阀陈珪璋部谢牛旅袭击。激战中，部队损失过半。冲出重围后，为保存骨干，休养生息，刘志丹率骨干百余人到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挂名建军，被编为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副团长，马锡五任军需，驻防于陕西旬邑县职田镇。期间，刘志丹联络旧部，筹备军需，扩大队伍。此举遭苏雨生戒备，故意制造事端，在彬县秘密扣押刘志丹做人质，并威逼部队交出武器。后经党组织积极营救，刘志丹脱险出狱。

1931年6月，刘志丹根据陕西省委与甘肃军阀陈珪璋谈判，收编土匪李培霄武装的指示，前往甘肃平凉与陈珪璋谈判获得成功，刘志丹被任命为陈部第十一旅旅长，驻防宁县、正宁一带。陈令特务二团团长刘宝堂带一个营配合协助收编

李培霄。刘志丹到宁县后，很快集中旧部 200 余人，壮大了队伍。刘志丹带 100 余人驻早胜镇，其余驻宁县城内。后因陈部蒋云台、谢牛两旅从中作梗，收编未果。同时陈部第十三旅旅长高广仁哗变，扣押刘志丹，北上宁夏，途经甘肃合水县时，被蒋云台旅击溃。刘志丹乘机脱险，返回南梁地区。

从 1929 年至 1931 年，谢子长、刘志丹等一批共产党人在陕甘地区先后发动了数次兵暴，虽然都失败了，但它为党创建革命武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锻炼了大批骨干，扩大了政治影响，打击了敌人的反动统治，为我党在西北地区组建正式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从军事、组织和政治上创造了条件。正如刘志丹所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 70 多次的兵暴，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逐步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兵暴失败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最主要的是受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中共陕西省委错误地估计了斗争形势，否定了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指导思想上的盲动主义，致使兵暴条件不成熟的部队过早行动，造成了不可避免的损失。

第二节 南梁游击队成立

1931 年 7 月，刘志丹在认真总结兵运工作多次失败的教训后，毅然来到陕甘边地区，在桥山山脉中段的子午岭山区联络旧部，准备组建革命武装。当时，陕甘边地区人烟稀少，

居住分散，没有产业工人，突出的特点是子午岭山区聚集着大批荷枪实弹的绿林武装。这些人当中，有少数为浪荡江湖、落草为寇、打家劫舍的土匪，但更多的是不堪忍受反动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贫苦农民。刘志丹正是从陕甘边地区的实际出发，在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的同时，经常深入“山大王”和饥民群众的驻地，宣传革命道理，开展争取和改造工作。先后依靠杨培胜、赵连璧、贾生财等人，在子午岭山区组织起来三支队伍，指导他们在山区占据一定的地盘，为实现“工农武装割据”创造了条件。

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在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集合旧部杨培胜、赵连璧、贾生财三支队伍，进行整编。组建起陕甘边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马锡五任军需。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全队共300余人。同时正式成立了中共队委会，刘志丹任书记。南梁游击队成立以后，刘志丹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坚持以南梁为中心，依托桥山山脉开展游击活动，开辟南梁游击区；加强对部队的教育工作，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严肃了军纪，积极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小股部队到游击区周围打土豪，分粮食，解决部队的给养，减轻群众的负担。南梁游击队组建后，部队士气旺盛，战斗情绪饱满。首战二将川，旗开得胜。全歼敌张廷芝一个骑兵连，缴获枪30余支、战马40余匹。接着又击溃合水民团的进攻，一时南梁游击队名声大震，敌人惊恐不安，人民群众兴高采烈。南梁游击队不仅在军事上站住了脚，政治上扩大了影响，而且部队也得到发展壮大，由

300余人发展到400余人。当地群众编歌颂扬刘志丹：“正月里来过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刘志丹来真勇敢，他带队伍上横山，一心要共产。”此后，南梁游击队便在子午岭山区坚持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扩大武装，为正式组建红军和创建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1930年9月，中原军阀混战结束。阎锡山、冯玉祥失败，山西政局一片混乱。中共山西省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组建工农红军，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山西省委抽调拓克宽、杨重远、胡廷俊、吴岱峰、马佩勋等一批有斗争经验的共产党员作为游击队的骨干，从太原兵工厂抽调一批工人作为游击队的组织基础。同时，中共陕北特委奉中央北方区委的指示，派遣阎红彦、白锡林等10余名斗争骨干前往晋西筹建游击队。1931年4月下旬，游击队在孝义县楼底村召开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吴岱峰任副大队长，下辖两个中队。一中队队长阎红彦（兼），二中队队长白锡林。全队共约40余人，之后，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吕梁山区开辟了一定的游击区，部队迅速发展到了100余人。

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威慑了反动当局的统治。1931年8月，国民党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调集重兵“围剿”游击队。经过数次激战，终因寡不敌众，游击队被迫转入深山密林。这时，中共山西省委又遭破坏，游击队与上级失去联络，活动区域越来越小，处境十分困难。针对这种不利形势，游击队决定分散活动，一部分同志潜伏下来，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同志（约30余人）于9月3日晚，西渡黄河，进入陕北。9月4日，部队到达安定县南沟岔进行休整，选举阎红彦

任大队长，吴岱峰任副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9月5日，阎红彦率游击队到达安定枣树坪，与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取得了联系，要求扩大武装。安定县委立即动员马云泽、强龙光、强世卿等数十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参加了游击队。不久，陕北特委派人传达指示，令游击队在安定（今子长县）、清涧、延川、延长、靖边等县开展游击活动。9月10日，游击队首战安塞县平桥之敌告捷。次日又在安条岭击溃敌高雨亭营及民团300余人。游击队的不断出击，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积极开展政治宣传，使活动在黄河边的师储杰、杨琪、杨鼎等保票武装接受我军的条件，并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将其改编为一个支队，共300余人，师储杰任支队长。10月5日，游击队返回安定，取得了寨儿山战斗的胜利。7日奔袭玉家湾，全歼守敌一个加强骑兵排。当日中午又乘胜攻打瓦窑堡，迫使敌人退守米粮山，固守待援。不久，游击队在延川县清平川岔口，遭敌高双成部两个营的兵力包围，苦战一天，当晚突出重围，转移到安定县凉水湾。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陕北特委立即令游击队避敌主力，转至甘肃陇东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1年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进入南梁地区。南梁游击队得知后，刘志丹立即派人前往迎接。月底，晋西游击队和南梁游击队在南梁地区的林锦庙胜利会合。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壮大了陕甘边区革命武装力量，为进一步坚持游击战争、巩固扩大游击区域，鼓舞了士气，树立了信心。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合后，陕西省委非常重视这支革命武装，即派谢子长等人前往南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

并成立了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任委员。1931年12月，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和西北革命发展的形势，要求各级党组织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武装力量，组织和发动游击战争，打击敌人，扩大其政治影响。省委派荣子卿到游击队传达了省委的这一指示。12月底，游击队沿子午岭西侧南下，行至庆阳县六寸塬，击溃了陈珪璋部两个连的阻击，继续南下。之后，省委进一步指示游击队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决定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2年1月初，游击队到达正宁县柴桥子村。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军人大会。会上，省委代表荣子卿宣布“西北反帝同盟军”正式成立的命令，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时成立了同盟军党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荣子卿任委员。部队编为两个支队。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队长雷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兼），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亦辖三个大队、一个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成立大会上，还举行了庄严的授旗仪式，战士们深受鼓舞，群情激昂。整编后，部队共700余人。同时两支队均建立了党的支部。

西北反帝同盟军成立后，立即移驻正宁县三嘉塬整训。由于部队给养、弹药补充十分困难，部队一边整训，一边派出人员筹集粮、弹，同时组织发动群众解决供给问题。此期间，

二支队一大队队长赵连璧率部队外出打土豪时，由于打击对象不准，破坏了群众纪律。队委会部分同志认为这是“土匪行为”，为贯彻省委“反右倾主义、反调和倾向”的指示，决定清洗部队不纯分子。令一支队收缴了二支队的枪械，并解散了队伍，开枪打死了赵连璧和三大队副大队长谷聚山。次日晚，一支队队长师储杰带领旧部 100 余人密逃，不久投靠了军阀杨虎城部。在这紧要时刻，刘志丹等同志以革命大局为重，积极维护同盟军的团结，说服并留下了将要解散离去的部队，避免了革命队伍的分裂。

第三节 组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1931 年 9 月，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中央作出《关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向非苏区的陕西等八个省提出“在某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的任务。11 月 25 日，中央又向陕西省委发出了加紧发动农民斗争，建立红军以发展到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的轨道上的指示。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陕西省委进一步加强了对陕甘边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积极开展组建红军的工作，使游击战争在这一区域广泛地开展起来。

1932 年 1 月中旬，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又名高维翰）来到部队，传达了省委新的指示：要求部队打出红旗，改编后南下渭北开展游击战争。三嘉塬整训后，三原武字区和旬邑县地下党组织动员 100 余名青年农民前来参军，充实了同盟军的队伍。2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

三嘉源锦章村召开军人大会。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改编命令：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同时宣布了游击队的建制及主要负责人的名单。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游击队还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建立了党支部，任命了部分政治工作人员。这次改编举行了授旗仪式，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公开了这支队伍的性质，游击队员们身系红色“牺牲带”，表示要为革命取得成功，不怕流血牺牲而奋斗到底。这次改编，标志着西北革命的发展发生了一次转折性的变化。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根据省委指示，立即南下开辟新的游击区。2月13日攻占旬邑职田镇，消灭地方民团，捣毁敌区公所。之后地下党组织报告，驻张洪镇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旬邑、淳化三县民团约1000余人前来“围剿”游击队。总指挥部将计就计，决定在途中设伏将其击溃。15日，游击队进至旬邑县阳坡头一带，进入伏击地域，由于敌警卫三营内我地下党员李明轩的配合，阳坡头伏击战获胜，一举将敌击溃，歼敌300余人，缴枪支一部。战后沿马栏河进入土桥塬一线，部队抓住战机，偷袭照金镇获得成功，全歼照金镇民团。然后，部队转战在铜川、宜君、黄陵一带。先后消灭瑶曲镇民团和驻焦家坪敌一个连，击退富平、铜川、耀县民团的两次进攻，共歼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

3月中旬，陕甘游击队进入正宁县境内。为支持群众抗粮抗款斗争，游击队队委会即决定改变行动计划，暂不向旬邑

前进，就地组织农民进行斗争，配合群众攻打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3月19日晚，部队开始行动，因向导迷路，贻误战机。第一次攻打山河镇失败后，游击队及时召开了队委会会议，重新讨论了行动计划。会议形成决议：第一，游击队到南塬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活动；第二，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编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第三，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第四，准备再次攻打山河镇；第五，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20日，部队开抵寺村塬，将原群众武装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任副总指挥。同时，游击队派出骑兵张贴标语，宣传发动群众，于3月下旬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李杰夫任主席，张静元任副主席。在游击队的支持下，赤卫军和群众开展了打土豪、除恶霸的活动，开仓分粮解救饥民。这一活动的开展，鼓舞了群众的斗争士气，扩大了政治影响。31日，游击队在1000余群众的配合下，再次攻打山河镇。镇内守敌刘西坤、刘湘林的保安队及军阀陈珪璋余部，凭借坚固工事固守，攻城未克。4月1日，游击队改变计划，部队进至西坡埋伏了敌援军一个骑兵营，毙敌50余人。敌锐气大减，逃入山河镇内，我军随即发起攻击，因攻城经验不足，攻城未克，撤出战斗。此次战斗，我军牺牲10余人。4月21日，游击队南下奔袭旬邑县城，一举突入城内，歼敌300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县城，震慑了敌人，鼓舞了人民，部队战斗情绪更加高涨。

4月下旬，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巡视，错误的指责游击队的领导，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名，撤销了谢

子长总指挥的职务，将其派往甘肃靖远国民党王子元部搞兵运工作。命令部队移驻旬邑马家堡休整。在此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分编成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吴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五支队队长，杨重远任参谋长。改编后，三支队西进永寿、乾县一带游击，截断了西兰公路，歼灭了几股民团。五支队则南下进入三原武字区。

三、五两支队进入国民党统治的西路、渭北主要防区，威慑了国民党反动当局。5月上旬，敌人调集重兵对游击队实行了分路“进剿”。省委急令游击队北撤，在旬邑县清水堡集结时，根据斗争需要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为政委。总指挥部成立后，认真分析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决定采取寻敌薄弱，攻其不备，各个击破的战术，粉碎敌人的“进剿”计划。5月15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歼敌五一一团两个连。5月17日，进至杨家店凤凰山再歼敌五一一团两个连，之后奔袭焦家坪，一举将守敌民团全歼。5月20日，游击队截断咸（阳）榆（林）公路，先后歼灭宜君县哭泉、大石板两股反动民团，之后进至五里镇又歼灭民团100余人。接着，部队进入黄陵县，在店头、龙坊镇消灭了几股民团后，然后向郃县（今富县）吉子峁转移。5月27日，游击队与尾追之敌孙友仁警卫团和冯钦哉部在吉子峁展开激战，突出重围，甩掉该敌。5月30日，转至郃县宁武镇，得知敌高双成旅一部在向宜川县英旺镇集结，总指挥部当即决定乘其未稳，消灭该敌。部队急行军一夜，于次日拂晓将敌包围，迅速发起猛攻，一举歼敌一个营和一个团指挥所。接着攻打临镇，由于负责牵制任务的部队未能及时

到达预定地域，失去战机，致使战斗失利，被迫撤出战斗。临镇战斗后，总指挥部根据省委指示，率部队南进韩城。会同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韩城自卫军。红军游击队在韩城的活动，引起国民党十七路军的恐慌，立即调集一个团的兵力，向其发起进攻。总指挥部为避开锋芒，指挥部队占据南山、香山抗击敌人。经两日激战，部队损失较大，主动撤出战斗，北上甘肃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休整期间，由于游击队在韩城作战失利，部队思想发生混乱，队委会召开会议，统一思想。决定依托桥山山脉，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会议撤销了刘志丹总指挥的职务，选举阎红彦担任总指挥，并将三、五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1932年6月，谢子长在靖远县组织兵变失败后，返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途中经甘肃隆德县城（现归宁夏）时，与共产党员杨林、高昆山、郝维新、高照璧等相遇，谢子长即令其前往甘肃合水县西华池驻军国民党新编十一旅特务营第一连高鹏飞处，加强兵运工作，准备武装起义。高鹏飞立即将这批党员骨干派往各排，同时，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计划，确定起义时机。该连在陕甘游击队的配合下，于7月8日，由高鹏飞、曹胜荣、杨林等率领宣布起义，消灭了特务营营部，并缴了二连的枪械，起义获得成功。阎红彦率游击队一大队前往接应，与起义部队170余人在宁县盘克下寨会合。随即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任命高鹏飞为大队长，阎润品任政委。

7月23日，省委派李艮来到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为

实现创建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的工作”的指示，并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李艮以解决游击队所谓“机会主义”为由，令部队停止游击活动，学习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的战术。并限令20天内将游击区五顷塬土地分配完毕，而置敌情于不顾。8月初，敌人从容完成了进攻游击队的部署，向我发起进攻。游击队仓促应战，接连三次战斗失利，部队伤亡较大。最后，部队只能分散突围，于8月24日到达旬邑县马栏重新集结。陕西省委立即对李艮的错误作了严肃的处理，但对陕甘游击队的基本认识没有改变，仍然强调要改变游击队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撤销了阎红彦总指挥的职务，重派谢子长任总指挥。部队随即转入耀县照金一带坚持游击斗争。

9月初，敌人再次向陕甘游击队发动了新的“进剿”。其部署是：甘肃陇东警备九十七团、九十八团从正宁、宁县一线由西向东进攻；敌八十四师二五六旅五一团以铜川为中心，由东向西进攻；陕西警卫团和何全升游击支队由彬县、旬邑向北步步逼进；富平、铜川、耀县民团由耀县向西进攻，企图将陕甘游击队消灭在照金地区。9月上旬，总指挥部率部主动离开照金，诱敌深入。此时，富平、铜川、耀县民团400余人进入照金扑空后，以为游击队“溃逃”，放松了警戒。总指挥部抓住战机，急速调整部队，连夜奔袭照金，次日拂晓从三面发起攻击。在北坟滩、柿坪将敌一举歼灭，活捉敌民团头子党谢芳、蔡子发等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战后，部队向西转移，进至淳化县安子洼，遭敌何全升部袭击，激战一天，歼敌一部，入夜撤出战斗。北上到达刘家店子，又遭敌甘军警备旅七十八团袭击，游击队迅速摆脱敌人，后进入

马栏一带。9月中旬，陕甘游击队到达南梁。25日，总指挥部决定攻打陕西保安县城。由于情报有误，致使攻击失利，部队伤亡较大，被迫向南梁一带转移，途经富县墩儿梁、八卦寺，遭敌高双城部张子英团和高雨亭营的袭击，部队再次受挫。总指挥部决定化整为零，分路游击，筹粮筹款，渡过难关，重振旗鼓。刘志丹率一部（约70余人）进入合水、庆阳、宁县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杨森率渭北游击队（约四五十人）进入三原心字、武字两区坚持斗争；谢子长带一部（约20人）游击队员掩护伤员（三四十人）在平定川山林休养治疗；阎红彦、杨重远率骑兵团进入照金地区，准备与省委取得联系。10月中旬，阎红彦率领的一部队伍在耀县老爷岭筹集了大批经费，返回南梁，解决了游击队的给养供给，然后进入安塞、安定一带活动，又筹集到一批经费。刘志丹率领的一部队伍，在合水、庆阳交界黑木塬、塔尔塬、店子塬一带开展游击，筹集到一批粮食，使游击队的给养供给得到保障。陕甘游击队经过两个月的休养生息，部队恢复了元气，士气高涨，12月中旬，各路部队在甘肃合水县黑木塬重新会合。游击队这一短暂的休整，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为发展正规红军部队创造了条件。

第二章 组建红二十六军 开辟陕甘新苏区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建立以后，坚决执行省委关于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积极努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力量和军事上的根据地，其政治影响迅速地深入到陕甘两省的群众中，军事上对敌构成了极大的威慑，游击区域已扩大到陕甘边10余个县。这一胜利的取得，为推动陕甘边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壮大革命武装力量，组建红军部队奠定了基础。

第一节 红二团成立

1932年3月21日，陕西省委致信中央，在《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已于一月前在陕甘境旬邑举行宣誓授旗典礼，发表宣言通电指令等共编制三个大队，设立总指挥部，人数共400余人，枪300余支。”“因各方面的配合，军事上必须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么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陕西省委在请示报告中，综述了陕甘边地区群众斗争空前高涨，游击队日益壮大的有利形势，提出建立陕甘新苏区，组建正式红军的任务。4月20日，中共中央迅速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省委在“积极的开展游击战争运动中，组建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要求“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有力

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开展’。”决定编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责成陕西省委选派一名常委，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1932年6月1日，省委在《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建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中指出：“中央关于陕西目前政治形势的估计完全正确”。游击队执行“……创造北方新的苏维埃区域；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运动中创造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区域的任务；巩固游击队的根据地这三个主要任务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应当成立红军一个团（依据红军编制法每团三连，每连三排，每排三班，每连可编枪七八十支），并努力在最短时间编成红军一师。”1932年6月10日，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指出：北方党的基本任务首先是“创建巩固与发展陕甘新苏区”。6月26日，会议通过了《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强调北方党的基本任务和工作之一是“创造巩固和发展陕甘边新苏区”，红二十六军要“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8月25日省委根据北方会议的精神，通过了《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决定在陕甘边区域建立红二十六军，派杜衡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职务，决定：“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即编成红军一团”。

1932年12月18日，陕西省委命令陕甘游击队进至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待命。省委派杜衡来到陕甘游击队，负责红二十六军的组建工作，并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职务。12月22

日，军政委杜衡在杨家店子主持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了中央和省委关于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指令。军政委杜衡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中存在的“机会主义领导”，诬指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反对省委正确路线”，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强令他们离队去上海中央局“受训”。为保存军事指挥员，更好的发展红二十六军，在谢子长、王世泰等人的力争下，刘志丹被留在了部队。谢子长、阎红彦被迫离开部队去上海。

1932年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开到宜君县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仪式。会上，军政委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的命令，任命王世泰为红二团团长；杜衡兼政委；团参谋长郑毅；团参谋处处长杨重远；团政治处处长刘志丹；团经理处处长刘约三；团管理处处长杨琪；共青团书记师克寿。下辖三个连，李亚夫任步兵连连长，李秉荣任指导员；曹胜荣任骑兵连连长，张秀山任指导员；王有福任少年先锋连连长，魏武任指导员。全团共约200余人。会上举行了庄严的典礼仪式，宣布了红二十六军的性质、宗旨、任务和纪律，号召红军指战员为创建陕甘边新苏区而战斗。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建起来的，是我党在西北地区成立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队伍。它的成立，标志着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对国民党反动派、军阀等反动武装产生极大的震撼，扩大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政治影响，树立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更加坚定了广大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为西北革命斗争走向胜利树立了一面鲜艳的战斗旗帜。

第二节 创建照金根据地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成立以后，省委对该团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积极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二是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游击队武装，扩大苏区，把照金与渭北苏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向西路地区发展。红二团受领任务后，立即进入耀县照金地区，开始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新苏区。

照金，位于耀县境内，为桥山脉南端的一个突出地带，与淳化、旬邑、宜君、铜川四县交界。它北迄子午岭中段；南接渭北平原；东可截断咸榆公路；西可扼制西兰公路。该地丛林密布，地形险要，山峦叠嶂，进可攻，退可守，是一个良好的游击战争活动区域。该地敌人的据点，除已被陕甘游击队拔掉一部外，仍尚有焦家坪、瑶曲、庙湾、柳林、马栏、照金、香山等据点，严重威胁着我军的活动。为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巩固扩大根据地，红二团决定拔掉照金地区的敌人据点，打开斗争的新局面。红二团对敌情作了认真分析，为鼓舞士气，打好建军第一仗，决定首战较弱的焦家坪之敌。

焦家坪据点距我红二团驻地杨家店子较近，平日据点守敌加强防范，并将哨卡设在山梁之上，以防我军偷袭。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团领导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先麻痹敌人，后乘其不备，将其拔掉。并制定了周密的部署。12月25日下午，部队撤离杨家店子，向与焦家坪反方向的马栏据点进军，摆出一副攻打马栏的态势。焦家坪守敌得知这一情报，误认我军西撤，便放松警戒，撤除了山梁观察哨。红二团行进20余公里，见战机形成，当夜回返奔袭焦家坪守敌。部队

急行军40余公里，26日拂晓将敌包围，并迅速发起攻击。红二团步兵连首先发起攻击，一举突破敌人防守，将敌击溃，骑兵连乘胜追击，将敌全歼。此次战斗俘敌60余名，缴枪60余支。战斗结束后，部队迅速撤离焦家坪。首战告捷，使红军指战员士气倍增，部队声威大震，打击了游击区内敌人的嚣张气焰，同时也显示出了刘志丹的军事指挥艺术。

战后，红二团进入香山寺一带，寻机歼敌。

香山寺，位于照金东北笔架山，地势险峻独特，寺产多达数十万亩，贮有大批的粮食和物资，时值灾年，近万难民流落此地。为拯救灾民，团党委决定，进占香山寺，开仓放粮。群众分得粮食，无不感谢红军。此后，红二团向西发展，消灭了照金和旬邑民团各一部，使红军游击队区域扩大到薛家寨、照金地区；扩建了步兵第二连，任命吴岱峰为连长，高锦纯为指导员，全团发展到300余人，拥有长短枪300余支；成立了随营学校，培养军事干部，李杰夫任校长，汪锋任政委，学员30余人；部队继续南下，消灭淳化铁王镇民团大部，出击通渭镇，进入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艰苦战斗，横扫了照金腹地和周围区域的反动武装，先后帮助地方党组织了香山、茅园、照金、旬邑、宜君5支游击队，初步打开了斗争局面。

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红色割据区域逐渐形成的有利形势下，杜衡错误的估计了敌我力量对比，令红二团打大仗，扩大红军声势，加快建立根据地。提出“集中力量，一鼓作气消灭根据地周边的豪绅地主武装”。红二团在研究下步行动的军事会议上，杜衡决定攻打庙湾民团。庙湾为民团团总夏玉山指挥部所在地，地势险要，筑有碉堡，防守严密。陕甘

游击队时期我军曾与该民团建有统战关系，该部曾给游击队提供过武器、给养和情报。对此，刘志丹、王世泰、杨重远等同志提出暂不攻打庙湾守敌，此意见遭到杜衡否决。此次行动虽没有具备攻打时机条件，但红二团也认真进行了部署：令刘志丹、杜衡、郑毅带主力沿近路进入庙湾，于拂晓发起攻击；由团长王世泰率骑兵连堵截逃敌，在野战中将其歼灭。

1933年1月17日晚，红二团分两路向庙湾开进。由于对山地距离估计不足，致使主力未能按时进入地域。次日8时，庙湾方向传来枪声，已进入阵地的骑兵误认为主力与敌接火，向敌发起攻击。攻占庙湾街后，向敌固守工事发起猛烈攻击。团总夏玉山见我军攻势凶猛，立即率部退入三个碉堡，凭借坚固工事，抗击我军进攻。骑兵连长曹胜荣，指导员张秀山身先士卒，率先冲向敌人碉堡。这时，红二团主力赶到，立即投入战斗。但是由于我军缺乏攻坚能力，虽多次强攻，终未奏效。战斗持续到12时，部队本应撤出战斗，调整部署。但参谋长郑毅仍坚持组织强攻，先后又发起5次攻击，未克该敌，战斗持续到下午，骑兵连长曹胜荣英勇牺牲，指导员张秀山身负重伤，部队伤亡排长以下30余人。因久攻不下，部队只好撤出战斗。战后，部队认真总结了失利原因，干部进行了调整。参谋长郑毅被撤职，任命刘志丹继任。强世卿任骑兵连连长，团参谋处长杨重远兼任指导员。庙湾战斗的失利，主要是出于决策者杜衡“打倒一切”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导造成的。其次战机没有形成，地形侦察不细，缺乏攻坚器材等，致使伤亡过大，战斗失利。之后，红二团返回照金休整。

红二团经过连续出击，使游击区迅速扩大和巩固，地方

游击队相继建立，革命形势有了明显发展，威胁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敌人立即调集重兵对根据地和红军进行“进剿”。1933年元月底，国民党十七路军调动骑兵团、警卫团、特务团及各地民团，在总指挥孙友仁的指挥下，开始向红二团发动围攻。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刘志丹等同志认为，红二团应避敌锋芒，转入敌后，寻机歼敌，以达到调动敌人，争取主动的目的。杜衡则令坚守根据地，与敌抗击。最后，正确意见遭到否定，杜衡独断指令红二团进入芋园抗击敌人进犯根据地。2月4日，敌步、骑各一个营及庙湾民团分三路向红二团驻地芋园发起突袭，将红二团包围，红二团奋起还击，遭敌猛烈炮火杀伤。紧要关头，渭北游击队及时赶到，从敌侧后出击将敌部署打乱，红二团主力乘机突出重围，安全转移。芋园战斗，红二团遭到挫伤，其根本原因是杜衡“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强行贯彻造成的。芋园战斗后，红二团和渭北游击队进入照金根据地中心区域，在正确意见的指导下，决心集中兵力，避强击弱，粉碎敌人“进剿”。红二团在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配合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地骚扰敌人，使得敌人昼夜不宁，不久进犯之敌便退出了照金根据地。3月3日，军政委杜衡自行返回省委机关汇报工作。

随着陕甘边斗争形势的发展，在红二团的有力配合和影响下，地方游击队迅速得到扩大。为统一领导，陕西省委指示，以照金、旬邑等游击队为基础，组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李妙斋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委。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后，进一步

加强了地方党的领导和政权建设，使土地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为巩固发展照金根据地，壮大红二十六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外线，向东出击，打下铜川金锁关，消灭了当地民团，切断咸榆公路。随后，进军三原武字区，与渭北游击队会合。由于游击队地理熟悉，使红二团活动范围扩大，捕捉战机及时。攻打心字区北塬守敌时，红二团采取佯装溃逃的战术，诱守敌出动，一举全歼敌骑兵团一个排。4月5日，红二团南下泾阳一带活动。在三原、泾阳交界处，俘敌护渠队（内有美国水利工程师安立森），缴获枪支、炸药一部。安立森被俘，杨虎城十分惊慌，派一个团的兵力乘汽车围堵我军，企图抢回。红二团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伏击该敌。敌虽携有重机枪、迫击炮，但在晨雾中遭我突然打击，阵脚大乱，损兵一部。当敌调整部署，重新组织进攻时，我主力已安全转移到泾阳西凤山。红二团北渡泾河，先后消灭淳化县南村堡、旬邑县土桥镇等地民团数股，共计歼敌200余名，然后转入照金根据地休整。

红二团外线作战拔掉了根据地边沿地区敌人的据点。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巩固了照金根据地。同时，陕甘边特委和游击队总指挥部，进一步发动群众，为建立根据地的苏维埃政权创造了条件。1933年3月15日，陕西省委在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中指出：“边区的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经过了红二十六军的英勇斗争，是更有不同的发展，斗争更广泛地开展起来，斗争是深入了，群众自动起来消灭豪绅地主的统治，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现在条件之下，立刻由

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二十六军代表共同组成。”1933年4月5日，由陕甘边特委主持，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经济、文化、教育、内务及肃反等委员会。周冬至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同时，红二团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薛家寨，建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等后勤设施。使医治伤病员，部队军需供给，武器维修有了改善。之后，在红二团的积极协助下，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至此，照金根据地已发展到东至耀县高山槐、胡家巷；西抵七界石、黄花山；北迄王家沟、断头川；南接老牛坡、高儿堰，横跨耀县、淳化、旬邑三县边界。其地区面积已达5000平方公里，人口三四万人，形成西北地区第一个比较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照金根据地的建立，使红二十六军有了自己的休整的后方，为推动西北地区革命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红二团南下渭华失利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和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壮大，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极大惊恐，加之根据地游击队的不断出击，直接威胁着反动当局的统治。敌人一面调拨大批武器、弹药，装备根据地周围县区反动民团；一面派遣大批正规军，联合民团“进剿”根据地和红军。我根据地军民在党的领导下，奋起抗击，开展了反“进剿”斗争。

1933年4月下旬，国民党第十七路军警卫团、骑兵团、特务团与八十六师五一团，配属旬邑、淳化、耀县、三原、铜川、宜君6县民团，分兵4路，“进剿”照金根据地和红二十

六军。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党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举行了联席会议。决定李妙斋、习仲勋领导边区游击队，坚持根据地内的斗争；红二团深入敌后寻机歼敌，粉碎敌人的“进剿”。会后，红二团根据联席会议赋予的任务，转战淳化、旬邑、正宁、宁县、宜君等地，一路破敌。先后在宁县五乐堡、金村庙、段家堡消灭了敌正规军和民团 200 余人。坚持根据地斗争的军民，众志成城，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骚扰敌人，迫使敌人退出苏区。5 月 25 日，红二团返回照金根据地休整。

正当红二团和根据地军民浴血奋战，进行反“进剿”斗争的时刻，军政委杜衡从省委返回部队。他无视反“进剿”斗争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夸大不利条件，认为敌强我弱，群众基础差，根据地很难坚守。面对敌人的“进剿”，对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失去信心，主张撤离照金，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为制定红二团下一步的行动计划，6 月 17 日，陕甘边特委、红二团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在照金北梁召开了联席会议。杜衡违背陕西省委关于“红二十六军必须更要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二十六军向外发展根据地”的指示，否定了金理科、刘志丹等同志提出的坚持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依托桥山山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撤离照金苏区，进入渭（南）华（县）建立新的根据地。其理由：一是认为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二是渭华地形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三是该地区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四是可以得到红四方面军和陕南红二十九军的支援，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敌人。最后，杜衡强令红二团南下。出发前，红二团

召开全团大会，进行南下动员。为确保南下作战，红二团将伤病员转入地方休养，部队也作了必要的调整。

1933年5月29日，红二团撤离了照金根据地。下午，部队进入淳化县桃曲堰，遭该县反动武装保安队100余人的偷袭。刘志丹、王世泰亲率步兵从正面出击，将敌压至桃曲河边，骑兵从驻地塬上俯迁回敌后，截断其退路，该敌在我前后夹击下，全部被歼。此次战斗共俘敌80余人，缴获枪100余支；全部缴获转送地方组织，武装了淳化游击队。

30日，红二团行进50余公里，进入三原县二台地域，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在此，由杜衡主持召开了红军与游击队联席会议，再次研讨红二团行动方案。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当即遭到渭北游击队领导同志的反对：“红二团孤军深入敌人腹地，不利于红军开展斗争，建议红二团停止南下，重返照金根据地。”杜衡一意孤行，排斥了渭北游击队的建议，仍令红二团南下渭华创建新苏区。

31日，红二团进入三原县长塄。长塄守敌是富平县张德润保安团，该敌进驻长塄专门对付游击队和我地下党组织，捕杀革命群众，群众无不痛恨。长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红二团决定配合渭华游击队攻打该敌，营救被捕的苏维埃主席孙平章等人。战斗打响后，红军和游击队以少部兵力从正面攻击，骑兵连从翼侧发起佯攻，以吸引敌人，一部游击队员乘机营救被捕同志。由于敌事先将其转移，营救未果，部队黄昏撤出战斗，进入寇家庄。在寇家庄杜衡召开会议，提出回省汇报，指定汪锋代理政委后，便离开了红二团。

中共陕西省委得知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认为南下决策

错误，进入渭华将会断送红二团。决定令红二团停止南下，立即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前往三原县阻止部队南下。袁岳栋赶到三原时，与杜衡相遇。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由省委书记袁岳栋召集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和杜衡开了紧急会议。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当即决定由赵伯平通知中共高陵县党支部，将红二团拦截在高陵县境内，但是，待命令传到高陵县时，红二团早已渡过渭河了。

红二团在地下党的帮助下，从寇家庄进入高陵县境内。因高陵县位于渭河北岸，地势平坦，无遮无掩，水果纵横，加之驻敌重兵，刘志丹、王世泰便决定部队夜间通过。经一夜急行军，部队绕过高陵县城，进入渭河渡口。渭河宽 100 余米，时值夏季，洪水汇集，水深浪急。渭河渡口是通往西安的主要渡口，敌人修筑了炮楼据点，进行防守。经周密部署，红二团一枪未放，一举占领渡口，俘敌民团团总薛兆兰以下 20 余人，缴获枪 20 余支，船 2 只。在当地船工的配合下，红二团经两小时涉渡，顺利渡过渭河。随即部队经耿镇南下，途经霸桥时，我骑兵连歼敌一个连。之后又拦截了 13 辆敌汽车运输队，缴获大部急需军用物资，部队当即得到补充。经两天一夜的急行军，红二团行程 100 余公里，进入东骊山地域。该地右距西安 25 公里，有敌重兵把守；左距临潼 10 余公里有敌封锁；后有渭河天堑；前有东骊山。加上连续行军、作战，部队没有得到及时休整、补充，部分同志对能否冲出险境深感担忧。紧要时刻，团长王世泰，政委汪锋，参谋长刘志丹决定召开团党委紧急扩大会议，认真分析形势，统一了干部思想，坚定了斗争信念，稳定了部队。

6月2日拂晓，敌向我发起攻击，红二团迅速抢占制高点东骊山。与此同时，杨虎城警备一旅唐嗣桐率部与临潼保安团，从侧翼发起冲击，企图夺占东骊山，截断我军去路。我军指战员奋不顾身，身先士卒，先敌数分钟占领山顶，掩护部队主力向秦岭山口撤退。敌人拼命进攻，紧咬不放。为迅速摆脱敌人包围，刘志丹、汪锋率主力撤出阵地向羊毛山转移；王世泰率骑兵连抗击敌人，掩护主力撤退。骑兵连在王世泰的指挥下，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完成掩护任务后，杀开一条血路，翻越两座大山，日经5战，突出重围，并急行50余公里，进入蓝田县流峪口。由于该地山口地形险要，有敌民团把守，不利夺占，骑兵连即放弃从流峪口进入商洛的原定计划，迅速调整部署进入厚子镇穆家塬地域。

6月3日，红二团会合后欲翻越秦岭南下受阻，遂东进渭南县箭峪口，途中遭敌民团伏击，前卫一连迅速反击，歼敌大部，余部溃逃。之后调整部署，由随营学校学员和少年先锋队担任前卫，王世泰率骑兵连担任后卫，阻击尾追之敌，当部队进入隘口地域时，与敌民团遭遇。该地右掌悬崖，左为峭壁，前后受敌。刘志丹即令前卫迅速抢占右方无名高地，打通隘口。此时敌人已从无名高地另一侧展开攻势，争夺无名高地。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勇敢战斗，与敌展开肉搏战。随营学校班长黄罗斌带领全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抢先占领制高点，打退隘口守敌，前卫部队乘机发起冲击，一举将敌击溃。红二团遂向东进发，经周楚庙进入箭峪沟。

6月4日凌晨，红二团进入箭峪沟。该沟长达30余公里，道路崎岖狭窄，山石较多，骡马行走困难，部队前进速度缓慢。中午尾追之敌与红二团后卫接火。红二团当即令主力转

移，由团长王世泰率步兵第一连阻击敌人。战至黄昏，一连摆脱敌人。6月7日，一连进入青岗坪与主力会合。6月8日，红二团休息一日后继续前进。沿途红二团连续打退敌人堵截，于14日进至坝龙庙地域。至此，红二团共歼敌300余人，缴长短枪300余支。秦岭山区，地形复杂，悬崖陡峭，山路崎岖，部队进山之后，与党组织和群众失去联系。为摆脱困境，红二团于6月15日进抵蓝田县张家坪，调整部署，制定对策，摆脱敌人。张家坪位于西安至商县的交通要道口，四面环山，梢林密布，东西有一条小河，公路两旁地势平坦，该地住有群众10余户。16日尾追之敌突袭张家坪，团长王世泰立即带领步兵第二连迅速抢占西北无名高地，以树林为依托，集中火力，抗击敌人。在二连的掩护下，刘志丹率一部沿公路向西突围，汪锋率一部向南突围。在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的带领下，二连越战越勇，居高临下，顽强抗敌，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反扑，为主力安全转移争取了时间，战至黄昏，主动撤出。

汪锋一部从界牌沟突围后，穿越北沟、新店子、鸭峪、卡房、半沟、野竹坪进入葛牌镇。途中打退数次民团袭击，战斗中伤亡较大，进入甘家坪时，仅剩随营学校队长赵启民等六七人，此时，代政委汪锋负伤，留在群众家中养伤，其余化装成农夫，分散出山。

刘志丹一部沿公路向西突围后，率部进入南山兰桥后向北转入深山。由于该地区部队难以立足，为保存力量，刘志丹即令部队分散出山。之后，刘志丹率骑兵连指导员惠泽仁、一连二排排长贺彦龙等七八人，继续收拢部队。进至石头峪遭敌民团偷袭，激战中为掩护参谋长刘志丹，排长贺彦龙等

光荣牺牲。

王世泰率部突围后，进入两岔河北山，对部队重新进行了整编，保留二连番号，吴岱峰仍任连长，高锦纯任指导员。团部与直属队由杨文谟负责。为收拢部队，与刘、汪两部会合，在山区坚持斗争一个多月。由于部队生活极其困难，又有病疾侵扰。为保存革命力量，重树大旗，王世泰、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等召开会议，决定留少数人员继续收拢部队，其余大部分散出山，返回照金根据地。在王世泰的带领下，吴岱峰、高锦纯、杨文谟、曹士荣、马宜超等 18 名同志留下。5 天后，终于在石头山后沟山上找到了刘志丹。因汪锋是当地人，地理环境熟悉，此时已先行返回照金。

红二团在杜衡“左”倾错误的领导下，南下渭华两个多月，终因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敌强我弱，而遭受严重损失。第一支西北红军就这样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断送了。

红二团失利的消息传来后，渭南党的组织派人前往营救。沿途群众主动掩护红军指战员，闯关卡、渡难关。在游击队和群众的帮助下，红二团保留下来的骨干力量，途经 10 余县，冲过敌人盘查封锁，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在 1933 年 10 月 4 日，回到了照金苏区。

第三章 纠正“左”倾错误 确定 陕甘武装斗争战略方针

第一节 红四团成立与陈家坡会议

红二团南下失利后，中共陕西省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决心牢固树立红二十六军这面战斗旗帜，继续发展主力红军，开辟陕甘边新苏区，巩固照金根据地。

7月21日，在陕西省委的直接策划下，敌十七路军驻耀县之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的率领下宣布起义。随即解除耀县反动民团武装，收编雷天益地方民团，组成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政治部主任杨声（即刘映胜），一大队队长郑子明，二大队队长任建民，三大队队长张龙韬，四大队队长周德民，五大队队长谈国帆，每个大队辖一个民团中队。义勇军共计1000余人。但是，由于起义比较仓促，部队中党的组织基础较差，又没有及时对部队进行整编和改造，致使部队起义一个星期后在向三原北部地区进军中，遇到强大的敌人进攻，激战一日，部队被迫向北退却时，陆续溃散。最后只剩王泰吉等100余人，向照金转移。

王泰吉起义后，中共耀县县委组织领导成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组建了工农红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队长陈学鼎、政指张邦英。下辖3个分队，共近百人，60余支枪。三支队成立后，大力开展宣传，组织群众斗争，镇压了一批豪

绅、地主、反革命分子，筹集了一批巨款上交边区特委。不久，游击队也转移到照金根据地。

红二团南下后，我陕甘边区各游击队，取得了多次胜利。1933年7月，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①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拟以红四团为核心，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巩固照金根据地。7月24日，红四团正式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下辖3个连，共120余人。

7月28日，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随即叛变。杜衡带领特务到处抓捕我地下党员，使西安和关中地区的地下党员惨遭杀害，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8月，国民党“渭北剿匪司令”刘文伯调集6个团的兵力，对渭北根据地进行残酷的“进剿”。8月上旬，红四团被迫撤离根据地中心区域心字区、武字区，北上照金。

1933年秋，陕西党一连串的严重挫折，使陕甘边革命斗争形势处于严重困难的局面。在此严峻形势下，陕甘边特委积极领导根据地军民与敌人展开激烈斗争。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和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相继进入照金根据地，大大增强了根据地的红军力量。为便于斗争，组建一个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便成为当务之急。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对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与会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目前形势虽然严峻，困难很多，但仍有相当数量的红军和游击队，有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这股力量集中起来，就是打击敌人的一只有力拳头。照金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好，人民觉悟高，军民同仇敌忾，团结战斗，就

一定能战胜敌人。如果分散活动，在强敌面前，没有统一的指挥，就会被敌各个击破，就会失去照金革命根据地。会议统一了认识，通过了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陈家坡会议，是在西北革命处于低潮、陕甘边形势非常严峻的重要关头召开的，充分显示了边区特委的正确领导。会议所作的决议，对加强党对红军和游击队的统一领导、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进剿”，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后，集中兵力，东西出击。8月下旬，向东出击，先后在庙湾消灭民团一部，在高山槐消灭耀县雷天益民团1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在柳林消灭民团数十人。9月初，向西出击，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坡一带连续出击，消灭民团100余人。尔后转入正宁金村庙一带，消灭地主武装一部，缴获长短枪10支及部分物资。东西出击大获全胜，不仅恢复了部分根据地，而且扩大了革命武装，提高了指战员的革命斗志和胜利信心，同时也鼓舞了边区人民的斗志，使照金苏区日趋巩固。

9月中旬，临时总指挥部为扩大这一有利形势，决定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斗争，令红四团、西北民众义勇军和耀县三支队进入合水县境内开展斗争。部队到达合水固城川，与强世卿带领的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会合，此时的一支队有70余人，马30余匹。两军会合后，部队战斗力增强，士气更加旺盛。之后，部队继续南下，决定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张洪镇城池坚固，不易强攻，指挥部决定诱敌出城，在

运动中将其歼灭。其部署是：旬邑游击队攻城引敌出击，主力部队在途中设伏，预期歼之。战斗打响后，敌上钩出击，游击队且战且退，将敌引入我军伏击圈，一举将其歼灭。尔后，令俘虏带路，我军扮成团丁，攻入城内，歼灭守敌，缴获大批物资。此次战斗，歼敌县长以下160余人，振奋了民心，震慑了敌人。

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等历经千辛万苦，回到照金。刘志丹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任红四团二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做政治工作。红军和游击队的频繁出击，引起了敌人的惊恐和不安，陕西军阀企图将我消灭在照金一带。10月上旬，驻耀县小桥的陕西国民党十七路军孙友仁团和驻中宜、旬邑、淳化、庆阳的冯钦哉、何高候、赵文治等部开始布防，伺机向我进犯。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临时总指挥部召开会议，决定红四团、西北民众义勇军、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避敌主力，转入外线，寻机歼敌；习仲勋、李妙斋、张秀山、吴岱峰、高锦纯、黄子文等领导照金各游击队坚持根据地内的斗争，牵制敌人。根据刘志丹、王世泰的建议，红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第一仗攻打合水县城。10月12日，部队由照金出发，横穿马栏川，沿子午岭山麓经正宁、宁县，日夜兼程150余公里，于15日到达合水县境内黑木塬。部队随即展开紧张的战斗准备，同时派出侦察员查明了敌情、地形。

合水县位于子午岭山区的城壕川，是一个跨山城池。守敌为赵文治团一个连和保安队共约300余人。山顶筑有坚固的碉堡，城外左右各有深沟一条，悬崖陡壁，地势险要。东西筑有城门楼，高大坚固，为敌人城防重点。城郭要害部分

筑有里外双层护墙，均用石砖构筑而成，墙中还筑有隔墙，合水城池易守难攻。总指挥部在综合分析情况后，决心采取偷袭战术。具体部署是：组成一支精干登城突击队，率先控制制高点，用火力控制全城；迅速抢占东西城门楼，迎接主力入城。令红四团二连和陕北一支队组成主攻连，由强世卿指挥，随突击队攻城。王世泰担任攻城总指挥，率突击队夺取制高点。18日晚，突击队在王世泰的率领下，冒雨奔向合水城。部队急行军15余公里，于次日3时进入登城地域。攻击开始后，突击队员柴正祥手持3把刺刀，第一个登上城头，放下绳索。其他突击队员迅速攀墙而上，占领制高点，俘碉堡守敌一个班；并用火力控制了全城。尔后，突击队又占领东城门楼，俘敌一个排。在突击队的接应下，主攻连按预定部署攻占了敌连部、民团团部和县政府。此后，参谋长刘志丹率主力攻入城内，部队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拂晓战斗结束。此次战斗，除少数敌人逃跑，歼敌200余人，俘敌县长、土豪、恶霸等1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部，并救出被敌扣押的党员、干部、群众80余人。奇袭合水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和革命群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同时为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开展庆阳、合水等地的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在我军攻打合水县城之际，国民党当局又调集兵力，向我根据地发起大举进攻。10月13日，敌孙友仁团和耀县民团包围了我根据地薛家寨党、政、军驻地。我军坚守部队仅有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所辖第一支队、红二十六军后勤人员共计200余人。10月15日，敌人发起猛烈攻击，整个阵地淹没在一片火海之中。李妙斋、张秀山、吴岱峰身先士卒指挥部队奋勇抗击，连续击退敌人数次进攻，给敌以重大杀伤。战

斗中，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光荣牺牲。吴岱峰继任总指挥。

16日，敌以一个团的兵力，配属三原、淳化、耀县民团，在炮火掩护下，向薛家寨我党、政、军驻地发动了更加疯狂的攻击。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率领游击队和红军后勤人员，凭借有利地形，扼守险要隘口，顽强抗击，战斗持续了5日，打退敌人数十次冲击，给敌以严重杀伤，坚守住了阵地。敌人进攻受挫，改变战术，在叛徒陈克敏的带领下，乘夜暗偷袭我军阵地后山嵯峨薄弱地段，突入阵地。我军在腹背受敌，又无援军的情况下，被迫撤出阵地。突出重围进入正宁县柴桥子，与主力汇合。此后，临时总指挥部将红军和后勤机关搬迁至南梁平定川、豹子川一带。同时令游击队总指挥部率各游击队坚持照金根据地斗争。令指挥部特务队和淳化、宁县、正宁等游击队伺机向西发展，扩大革命根据地。

薛家寨失利主要原因是没有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区根据地，把自己株守在一个很小的苏区内。该地虽地形险要，但距敌主力较近，群众力量不够强大。同时红二团南下失利后，军事上暴露了我之缺点，助长了敌人进攻苏区的气焰。

我军袭击合水后，赵文治亲率全团扑向我军，企图与我主力决战。指挥部当即决定诱敌深入，疲惫敌人，灭其锐气，将其歼灭。我军与敌连续周旋，途经庆阳、合水、正宁、宁县，将敌拖得疲惫不堪，锐气大减。10月28日，我军进至庆阳县（今华池县）毛家沟门地域。指挥部见歼敌时机成熟，当即部署迎战该敌。毛家沟门坐落几个村庄，位于两山之间一条东西走向的山坳。待敌跟进，令陕北一支队打援，主力迅速抢占北山有利地形，给敌以突然打击，将其歼灭在运动中。

上午9时，赵文治见红军北撤，判断我军怯战，急令部队发起冲击，我军指战员沉着应战，待敌进至阵前数十米时，随着总指挥王泰吉一声令下，轻重火器一齐开火，敌死伤大片，顿时大乱。我军乘机发起反冲击。西北民众义勇军从正面，红四团二连从右侧，耀县三支队从左侧，战士们个个如猛虎下山，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红四团骑兵连奋勇冲杀，勇猛追击5公里，一举将敌全线击溃。此次战斗，共毙俘敌200余人，缴获枪200余支（挺）、弹药大部。毛家沟门战斗，重创赵文治团，再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大振了红军军威，大灭了敌人的锐气，扭转了红二团南下失利后陕甘边的被动局面。

红四团成立以后，我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正确领导下，集中优势兵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张洪镇、合水、毛家沟门等战斗的胜利，毙俘敌800余人，缴枪500余支（挺）、骡马100余匹。这一胜利的取得，为扩大主力红军，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组建红四十二师

陈家坡会议之后，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红四团和游击队，在照金、南梁为中心的广大区域里开展游击战争，一连取得了张洪镇、合水城、毛家沟门等战斗的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鼓舞了边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信心。但是，敌人不甘心失败，屡次集结进犯我边区，妄图消灭我红军和游击队。同时，由于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区薛家寨失守，给发展主力红军带来困难。为迅速

发展壮大主力红军，必须创建新的根据地，以保证主力红军的休整和生存。刘志丹根据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客观实际，主动与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特委领导交换意见，提出召开联席会议，商讨对策。刘志丹的建议，当即得到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特委的支持。

1933年11月3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议以毛泽东关于红色政权的理论为指导，总结了照金根据地斗争和薛家寨失守的经验教训，彻底清算了杜衡的“左”倾冒险主义，讨论了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以及今后行动方针等重要问题。会议统一了思想，作出了三项重大决议：

一、撤销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是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的，虽被“左”倾冒险主义所断送，但她产生的革命影响深得人心，震慑了敌人，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并为创建照金根据地和发展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立了功勋。继后，红四团成立，又为保卫照金革命根据地和工农民主政权发挥了主要作用，以小的代价换取了大的胜利，有力地削弱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统治，红军和游击队得到了发展壮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高涨，红军的威望更加深入人心。扩大主力红军，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掀起新的革命高潮，时机已经成熟。

二、建立三路游击区。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的长期存在”和“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的思想是指导建立三路游击区的主要依据。要扩大和巩固根据地，必须大力发展游击区，只有各路游击队发展壮大，不断骚扰敌人，打击敌人，歼灭敌人，积小胜为

大胜，才能不断扩大巩固革命根据地。与会同志统一了认识，一致通过了建立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一、二、三路总指挥部的决议。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三、开辟南梁根据地，建立红军大后方。刘志丹主张在桥山山脉中段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与会同志听取了刘志丹关于建立南梁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建议，并一致表示同意。确认以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早年谢子长、刘志丹在南梁开展过革命武装斗争，有开展斗争的基础，加之群众条件是外地难民，深受封建压迫之苦，有强烈的革命要求，便于发动；二是南梁地区位于桥山山脉中段，而桥山山脉北起盐池、定边，南至照金根据地，连接陕甘宁18个县，山大沟深，梢林密布，地形复杂，交通阻隔，便于我军活动。三是南梁是陕甘两省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虽有小股土匪和地方武装，但却不敢与红军对垒。在南梁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客观正确的选择。11月5日联席会议结束。

包家寨会议，是陕甘边党组织实事求是地解决陕甘边实际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是红二十六军建军史上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它总结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教训，及时作出了转移战略重点的正确决定，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的发展已经走向成熟阶段，使陕甘边的武装斗争以及红军、游击队的发展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包家寨会议结束后，为贯彻会议精神，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迅速率部进入合水县葫芦河川莲花寺对部队进行了改编。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

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师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下辖红三团、红四团，共300余人。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第三支队和红四团少年先锋队改编组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下辖三个连。一连连长赵国卿，指导员王伯栋；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全团共计200余人。红四团建制不变，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全团共计100余人，战马60余匹。同时，师、团成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杨森兼任师党委书记。

红四十二师成立以后，部队成分大部属贫农，少数为学生和解放战士、民团、绿林武装。他们深受地主封建势力的压迫，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反动军阀的残酷压榨深恶痛绝，有着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和阶级的属性所决定，难免存在着严重的小农经济思想，政治觉悟也不够高，组织纪律性也不够强，特别是解放战士，部分人沾染了旧习气。开展部队政治思想教育，已是部队发展的首要问题。整编后，部队广泛开展了政治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通过教育，使红军指战员充分认识到了建立党组织和加强纪律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的道理；涌现了许多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积极分子。

为推动陕北革命斗争的发展，扩大陕北革命根据地。师党委会令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返回陕北开展斗争。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在临时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征战。部队已由原来的70余人发展到100余人，战斗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武器装备也得到了补充和更新。同时，师

党委从主力部队选派一批军事骨干，加强了游击队的领导力量，游击队情绪高涨，士气旺盛，积极要求回师陕北，扩大根据地。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讲话，勉励游击队为扩大发展陕北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为发展一路游击区的武装斗争作出贡献。魏武代表一支队致答谢词，决心坚决执行包家寨会议精神，开展游击战争，进一步打击敌人。

红四十二师成立后，立即挥师南下，在照金配合各游击队，扩大游击区，主动出击，寻机歼敌，为创建三路游击区作准备。11月中旬，部队进入宜君县杨家店子，该地守敌一个连企图乘清晨浓雾之机偷袭我军。四十二师当即查明敌情，迅速令红三团从正面进攻，红四团迂回敌后，围歼该敌。

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的指挥下，一举将敌击退。此后，敌占领制高点，妄图与我军对峙。红三团迅速调整部署，令一连从正面攻击，二连、先锋连左右迂回，经4小时激战，夺占制高点，敌大部被歼。余部在溃逃中被红四团截歼。此次战斗，共毙俘敌连长以下120余人，缴枪120余支（挺），我军伤亡30余人。此次战斗的胜利，是我军指挥员沉着应战，迅速判明敌情，果断定下决心部署，实施机动灵活指挥取得的。

杨家店战斗之后，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地区。

红四十二师的成立，鼓舞了陕甘边区人民的革命斗志，推动了陕甘边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是红二十六军发展壮大的显著标志。

第三节 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南梁地区^②，方圆百里，地处桥山山脉中的大梁山南麓，位于甘肃庆阳、合水，陕西保安、甘泉4县交界处。南梁地区重峦叠嶂，沟壑纵横，梢林密布，地形复杂，远离陕甘宁三省统治中心。红四十二师为迅速打开局面，为创建南梁根据地创造条件，部队进入南梁地区后，立即兵分两路，师部率红三团向东出击，红四团向西发展。红三团东进咸榆公路，连续拔除敌人据点，消灭了沿线地方反动武装。进入甘泉县道佐铺消灭当地民团一部。随后偷袭甘泉，未克。部队转由洛河川向北前进，进至葡萄沟门，遭敌进攻。师迅速查明敌情，定下决心。即令红三团主力抢占葡萄沟门有利地形，以少部兵力诱敌深入，使该敌进入我军伏击圈，伏击该敌。该敌系二五六旅一个营另配属反动民团200余人，奉命从延安前来“进剿”我红军和游击队。敌见我军预有设伏，遂即停止前进。因敌有备，我军亦主动撤出战斗。在这次诱敌战斗中，红三团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光荣牺牲。此后，红三团返回南梁根据地。

红四团西进荔园堡、阎家洼子歼敌两个连。之后进入赵家沟门肃清了该地民团，后又全歼新堡民团。然后挥师二将川，与红三团会合，消灭了当地部分反动武装，拔掉了扼守据点之敌，为建立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初步基础。

红四十二师经过东西出击，打击了敌人，有力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为进一步发动群众，发展二路游击队，红四十二师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配合地方干部深入到根据地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

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地发动群众，开展宣传，发展壮大游击队。同时，红四十二师在平定川、豹子川设立了后方留守处。使伤病员有了治疗、休养的安全环境。

1933年12月，在红四十二师的配合下，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将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同时，新组建了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5个赤卫大队，共计100余人。赤卫队配备梭镖、大刀、猎枪，装备少量步枪，从事站岗、放哨、送信、监视土豪恶霸、转移伤员、保护群众等任务。赤卫队的建立，使红军、游击队有了后备军，加之积极配合主力红军作战，使南梁根据地得到了迅速发展。

1934年2月，红四十二师决定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扩建游击区。同时，护送王泰吉出边区。在此之前，王泰吉曾向师党委提出要离开部队去搞兵运工作。师党委经过慎重研究，考虑到他的安全问题，挽留他不要去。但王泰吉认为他利用原有关系，搞兵运工作比较有把握，坚持要去。最后，师党委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不久，王泰吉在淳化县通润镇被旧部出卖被捕，后押往西安，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红四十二师南下进入淳化，立即在淳化、旬邑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整顿了各游击队，发动群众，打击了当地反动民团武装，扩大了游击区。之后，部队北上南梁准备休整。途经正宁县湫头塬南邑村，部队宿营时，师政委高岗违犯群众纪律，在群众和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三日后，部队进入南梁康家砭召开了师党委会。会议对高岗破坏群众纪律，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决定撤销其师政委职务，调到第二路游

击队任政委。同时任命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1934年春节,红四十二师为解决部队给养,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南下进入耀县、铜川一带打土豪,筹集部队经费。寺沟南堡位于耀县县城附近,该地地主豪绅居住集中,堡子有少数地方武装据守,并筑有坚固的工事,易守难攻。师决定偷袭夺占寺沟南堡,因攻击行动暴露,偷袭未克,撤出战斗。此后,师进入耀县北塬,准备攻占生义堡。生义堡位于北塬沟畔的一个山嘴上,三面临沟,一面靠塬。该地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寨子居住着地主豪绅。师决心智取,令红三团抢占城门,得手后,夺占生义堡。由于部署周密细致,准备充分,部队仅半小时便夺占生义堡,没收了豪绅财产,解决了部队的给养。

期间,黄龙山土匪杨谋子一股60余人,窜入耀县石底子。该股土匪为匪多年,无恶不作,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师决心将其消灭,为民除害。其部署是,以收编为名,稳住该敌,待敌放松戒心,乘机解除武装。由于组织严密,各部配合协调,一举获得成功。缴长短枪50余支,杨谋子等罪大恶极的匪首被枪决,余下的经过教育,发放路费,返回家乡。此次除霸,人民群众拍手称快。之后,部队返回南梁休整。

红四十二师不断出击,建立了二、三路游击区,并抽调部分干部,拨出部分武器弹药,装备了地方游击队,使二、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武装力量迅速得到发展,使根据地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游击队、赤卫军三位一体的游击战争的军事体系。截至1934年2月,陕甘边红色区域已扩大到保安、安塞、甘泉、鄜县(今富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铜川、宜君、黄陵等14个县的部

分地区。此时，南梁根据地的创建已初具规模。

第一路游击队是以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为基础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强世卿任总指挥，魏武任政委，活动地区以定安县为中心，逐步向外发展。1933年11月中旬，强世卿、魏武率部队100余人向北挺进，11月15日到达安定县境内。由于游击队总指挥部求战心切，对敌情估计不足，于11月20日仓促向枣树坪并岳秀部一个正规连发动攻击，经过激烈战斗，未能攻克，部队损失很大。惠泽仁等5位同志光荣牺牲，总指挥强世卿身负重伤，离队养伤，后被叛徒出卖，惨遭杀害。部队由魏武率领向北转移，途中又遭文家铺敌人袭击，魏武不幸牺牲。为摆脱困境，部队分两路北至安定北区活动，但因损失过大，得不到及时补充，活动受阻，最后被迫分散活动。该路游击队虽然未能实现预定任务，但在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其中不少同志继续坚持战斗，为恢复陕北游击队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路游击队是以庆阳、合水、保安三支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杨琪为总指挥。辖合水游击队，庆阳游击队，保安游击队，安塞县游击队。在杨琪领导下，庆阳游击队先后收缴了东华池民团20支枪，动员60余名青壮年参加游击队，并以奔袭、偷袭等战术，接连消灭了太白镇、廉家砭、葫芦河3处民团，缴长短枪80余支，进一步壮大了自己，扩大了根据地。合水游击队先后消灭南梁民团30余人，活捉阎家洼子民团团总，缴枪30余支，使游击队迅速壮大起来。保安游击支队配合红四团骑兵连先后消灭刘家坪、阎家洼子等民团据点，巩固和扩大了南梁革命根据地。

第三路游击队是以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领导的各游击队

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第一任总指挥张明吾，出任不久遭叛徒暗杀，由王安民继任。老爷岭战斗中王安民英勇牺牲，总指挥由陈国栋担任，政委张仲良。三路游击队主动出击，先后消灭了柴场子、淳化桃园等地民团，不断配合主力红军作战，发展壮大了自己。1934年总指挥部辖正宁四支队、回民支队、正宁五支队、正宁八支队、宁县一支队、宁县三支队，赤水、淳耀、酆甘、中宜等支队共计500余人。经过历次艰苦战斗，锻炼了部队，打击了敌人，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出了贡献。

为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于1934年2月下旬，在南梁地区小河沟四合台主持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人民的政权机关——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文教等委员会。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使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有了统一的领导，推动了游击战争的进一步发展。1934年春，红四十二师派惠子俊、强家珍、马仰西等一批斗争骨干，前往庆阳以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开辟了南梁根据地西北苏区。

1934年11月4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会议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之后，陕甘边地区的庆阳、保安、安

寨、靖边、鄜县（今富县）、甘泉、旬邑、淳化、中部（今黄陵）、耀县、宜君、华池、宁县、正宁、合水等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至此，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南梁根据地的创建，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是红四十二师党委、陕甘边特委正确军事路线的胜利。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是南梁根据地成熟与巩固的显著标志。

第四节 粉碎敌人对陕甘的第一次“围剿”

红军的胜利发展和根据地的不断壮大，直接威胁着反动当局的统治，西北军阀甚为恐慌。1934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8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其部署是：令驻守庆阳一线的仇良民团、王子义团和民团谭世麟部向我红军和根据地分兵“进剿”；令耀县干部团、特务团、旬邑何高候团、洛川冯钦哉部一个团和延安张瑞楼团，陈兵堵截。总兵力一万余人。

敌人用心险恶，妄图迫使红军在南梁地区与其决战。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决心转入敌后，击其薄弱，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人“围剿”。其部署是：以二、三路游击队牵制、扰乱、袭击内线之敌；红四十二师主力深入敌后，消灭正面之敌。

3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迅速进入照金以北地区。敌判断我军南进，急令南线之敌正面堵截。红四十二师当即挥师向铜川、宜君出击，连续消灭了瑶曲、大石板、五里镇民团100余人，未待敌查明我军去向，红四十二师又转向西北，涉过沮水，进占店头

歼民团一部，俘敌 20 余人，缴枪 20 余支。之后，红四十二师经槐树庄、张村驿、黑水寺、太白镇进入南梁东华池一带休整。

3 月下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北上，在保安游击支队的配合下，采取声东击西、诱敌增援的战术，佯攻保安县城。红四十二师从保安金鼎山渡过洛河进至保安县城附近地域，待敌主力赶至增援时，我军突然调头西进，进入小蒜川、三道川。师部决定攻打蔺家砭守敌。其部署是：令保安游击支队包围敌张廷芝驻地金佛坪寨子；师主力攻打蔺家砭。此次战斗，一举击溃守敌张廷芝一个新兵营，歼敌 2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并捣毁了张廷芝老巢，封锁了西进的交通要道。29 日，红四十二师袭击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驻地高桥，俘敌区长以下 30 余人，缴枪 30 余支和大批给养物资。嗣后，部队对元城发起攻击，红三团一举攻占元城街道，消灭谭世麟民团一个连，毙俘守敌 100 余人，缴枪 100 余支和部分军用物资。然后师主力直扑李家梁子，又歼谭世麟一个骑兵团，缴枪 50 余支、战马 50 余匹。李家梁子战斗后，由于红四十二师深入敌后，连续取得胜利，使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根据战斗缴获和战斗需要，师部决定撤销红四团，将其改编为骑兵团。团长杨森（兼），政委张秀山。为进一步消灭敌人，打乱敌人的“围剿”部署，红四十二师决心进至合水县城，展开态势攻打合水县，诱敌主力增援，形成围城打援的有利战机。红四十二师经五蛟、悦乐、城壕川进至合水县赵家塬。合水守敌见红四十二师突然兵临城下，即向庆阳告急。王子义闻讯后，立即调集两个营另一个直属机炮连，共计 700 余人，连夜向合水扑来，企图里应外合，将我消灭。师部见战机形

成，迅速率部南下，进至西华池地域，抢占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圈，决心消灭增援之敌。具体部署是：红三团从正面抗击，第二路游击队从东翼侧冲击，骑兵团迂回敌后，形成南、北、东三面攻击态势。

4月2日，增援之敌进入西华池地域。该敌系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五团主力。首次与红军交战，骄傲自负，不可一世。敌人排着纵队冒进，骑兵马鞍上携着绳索，狂妄叫嚣用绳子捆红军，妄图一举将我歼灭。当敌人进入伏击圈后，我军各种火器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敌阵顿时大乱。骑兵团风驰电掣横扫敌群，红三团英勇抗击，第二路游击队勇敢冲击，经两小时激战，共毙俘敌600余人，缴枪600余支、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迫击炮弹数十箱、战马50余匹。

西华池战斗的胜利，是红四十二师实施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积极的创造捕捉战机，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决心果断，部署迅速；骑、步兵紧密配合，全体指战员不畏强敌，勇敢战斗取得的。此次战斗的胜利，使敌人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红军和根据地中，遭到了我军民的沉重打击。西华池大捷，是红四十二师继奇袭合水后的又一重大胜利。

正当红四十二师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第二路游击队配合红军主力深入敌后出击敌人时，敌仇良民团与谭世麟保安队，乘我后方空虚，进犯南梁根据地，并占领中心区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农会主席白杨珍、委员曹思忠，游击队伤病员、地方干部和部分群众50余人惨遭杀害。同时，该敌北上保安，杀害了刘志丹的家人及亲友。敌人在根据地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激起了广大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愤恨，纷纷起来拿起武器，坚

持与敌斗争。第二、三路游击队和各赤卫军，带领群众坚壁清野，奋勇抗敌。根据地内全民皆兵，使敌人耳目闭塞，寸步难行。

5月初，红四十二师向南挺进，攻打马栏据点未克，直抵耀县。红三团在王世泰的率领下，奉命攻打黄堡寨子，该团一、二连各一部，以灵活机动的战术一举将其攻占，全歼守敌。之后，师率部奔袭淳化县城。红三团担任主攻。其部署是：一连从南门、二连从东门出击，三连、先锋连为预备队。淳化县城，东临冶峪河，西靠大山，东南通道敌人防范严密。红三团决心夜间发起攻击，但因路程较远，部队行动遭敌察觉，师当即决定放弃攻城计划。

部队撤出战斗后，即向十里塬、马家山方向转移，部队经一日休整后，进至三里塬，将前往淳化的敌高侯团两个连包围，敌进退无望，龟缩退至甘家嘴村抵抗。三里塬甘家嘴，东西两面是陡峭的深沟，南北是半截塬。该村中间有一小块开阔地，中央为一个场院，四周筑有围墙，敌人据守场院，负隅顽抗。

战斗打响后，红三团一、二连分别由村东、北两面发起攻击。因地形限制，师政委杨森率骑兵下马从南面向敌发起冲击，战斗中不幸中弹负伤。指战员见师政委负伤，更加勇敢战斗，杀向敌阵。红三团进攻受阻，团长王世泰立即组织火力压制，经激烈战斗，将敌两个连全歼，缴获枪100余支（挺）、弹药一部。此次战斗，我军伤亡30余人。因杨森负伤治疗，师政委由骑兵团政委张秀山继任。骑兵团团长由赵国卿继任，骑兵团政委由高锦纯继任。

敌人在我根据地军民的连续打击下，又调整了“围剿”部

署。令敌仇良民团与庆阳民团向南压近，新调马弘章骑兵团驻守正宁山河镇封锁西路，冯钦哉团一个营和数百民团进驻直罗镇、黑水寺，另两个营进占杨家店、转角镇一线阻击、拦截我军，妄图围歼红二十六军于小关中^⑥一带。

根据敌人新的部署，红四十二师迅速动员和部署。决定部队北上避敌合围，并击其薄弱，将其击退。部队由淳化出发，经香山河、油房沟、黑牛峡进至正宁县五顷园子。得知冯钦哉部一个营已先于我军进抵石底子，企图堵截我军。师部令红三团将其消灭，打开北上通道，因敌骑兵跟进，战斗计划未能实现。当先头部队与敌骑兵遭遇后，红三团团团长王世泰亲率一排，迅速抢占制高点抗击敌人，掩护主力向南梁转移，然后率红三团进入和尚塬。敌冯钦哉一个营另200余民团企图偷袭红三团，该团沉着应战，留一部兵力抗击敌人，主力安全转移。两日后，与师主力在荔园堡会合。五顷园子战斗，一是敌情判断不够准确，遭敌马弘章骑兵袭击；二是战斗中各级指挥失掉联络，致使部队伤亡30余人。在此情况下，我指战员沉着应战，勇敢顽强；各部能独立战斗，机智与敌周旋，歼敌一部，摆脱敌人，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随着根据地的扩大和武装力量的增强，加强特委工作已刻不容缓。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反“围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调整加强了红四十二师和游击队的各级领导；决定加强陕甘边区特委的组织建设，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军事委员会的成立，使红军和游击队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指挥。南梁寨子湾会议是一次健全和加强陕甘边革命

根据地党的领导，推动根据地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的重要会议。

由于部队连续作战，急需休整和补充。6月上旬，陕甘边军委会令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北上陕北，与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会合，介绍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形势，并赠送一批军用物资；刘志丹率红三团开往保安作短期休整。

红三团经三日急行军，进至保安县马子川。马子川位于旦八寨子与金鼎山之间。保安县守敌高双成旅高雨亭营另保安民团，趁清晨浓雾之时偷袭我军。该敌一直驻守保安县城，战斗力较强，是高双成旅的主力营。敌企图前后夹击，将我歼灭。我军判明敌人企图后，立即令二连跑步率先抢占制高点，将敌击退。敌人组织敢死队，连续发起冲击，妄图夺占制高点。刘志丹、王世泰立即令先锋连坚守制高点，集中火力从翼侧出击，将敌击溃。此次战斗歼敌1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部。此次战斗的胜利，是我指战员判断敌情准确，部署迅速，实施灵活机动的战术；全体指战员英勇顽强，紧密配合取得的。

由于红四十二师转入敌后，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并在各路游击队的配合和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使敌人新的“围剿”计划再次落空，被迫退出根据地。在历时七个月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十二师在正确军事路线的指导下，在苏区人民和游击队的紧密配合支援下，集中优势兵力，深入敌后，各个击破，打乱了敌人的“围剿”部署，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依托有利地形，待机破敌，经过大小30余次战斗，取得了歼敌3000余人的重大胜利。使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大“围剿”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根据地建设得到迅速发展，游

击队得到发展壮大，装备得到补充和加强。第一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甘边苏区迅速扩大，各地游击队随之发展壮大。

注 释

①渭北游击队是中共陕西省委和三原的党组织领导创建的。1931年5月，三原武字区武装赤卫队成立，后改称武字区游击队、游击大队，孙铭章任队长。1932年8月1日，渭北游击队成立，马志舟任队长，金天华任政委。1933年3月成立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下辖第一、二大队。

②由于该地区中心区域为荔园堡川的南梁堡，故称南梁地区。

③小关中系三路游击区。

第四章 开展游击战争 不断 扩大红二十六军

第一节 阎家洼子会议

1934年7月初，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总指挥部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陕北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随着陕北革命斗争形势的蓬勃发展，为加强陕北游击队和陕甘红二十六军的联系，实现陕北和陕甘边两根据地的战略协同，共同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7月18日，总指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和200余名赤卫军南下陕甘边，同红四十二师在南梁会合。

两支部队会合后，总结回顾了过去斗争的经验教训，为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和任务，决定在阎家洼子召开联席会议。7月2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及陕北特委代表，陕北游击队队委会召开了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军政领导有谢子长、刘志丹、高岗、习仲勋、杨森、赵国卿、龚逢春、郭洪涛、张秀山、王世泰、贺晋年以及红二十六军连以上干部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支队长以上干部。

会议总结了陕甘边根据地和红四十二师的发展壮大的经验；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信；研究商讨了陕甘边、陕北今后开展工作的方针、任务。

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代表师党委汇报了建师以来部队的发展、根据地建设的情况和红四十二师今后发展的方针；同时对根据地建设应制定的政策提出了建议。与会多数同志对红四十二师的汇报和建议表示赞同，并充分肯定了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认为红四十二师面对敌人多次“围剿”，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创建了南梁根据地，为西北革命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认为红四十二师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并得到了会议的通过。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红三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

会议宣读了上海临时中央局、中共北方代表的两封信。信中指出红二十六军的战略转移是“逃跑主义”、“梢山主义”，部队的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对于信中的指责，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用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发展的事实，进行了抵制。与会同志集中对现实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会上虽然“左”倾机会主义的批评没能实现，但为后来“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肃反埋下了阴影。会议还作出决定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任命谢子长为红四十二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

此次会议，通过了红四十二师的汇报和建议，标志着红四十二师在政治上、军事上日趋走向成熟，决定红二十六军协助陕北发展红军和苏区，为进一步发展和扩大西北革命根据地^①，尽早实现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创造了条件。尽管“左”倾机会主义代表谴责了陕甘边红军和苏区的发展的经验，但多数同志还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形成了正确的发展方针，有力地推动了西北根据地的发展。

第二节 参加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

阎家洼子会议之后，师政委谢子长率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挺进陕北。于8月15日进至安定县西区，揭开了陕北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

进犯陕北根据地之敌，乃敌八十六师五一五团和地方反动民团武装，主要进攻区域为安定、清涧地区。其部署是，以连为战，多路出击，向我游击区发动“围剿”，妄图消灭陕北游击队。红三团和游击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根据敌人分散兵力，多路进犯的部署，决心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术原则，将敌歼灭，求得陕北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8月17日，师政委谢子长率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攻打进犯安定县金吴塌村守敌。该敌为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一个连，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金吴塌村，位于一条大沟的半坡上，筑有四五层窑洞，村背靠高山。该敌驻守于村内。

其部署是：以红三团担任主攻，率先占领村后高山，控制制高点，向村中守敌发起冲击；令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抢占沟对面有利地形，切断敌人退路。18日拂晓，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的指挥下，以突然猛烈的火力，一举攻入村内，经激战，歼敌一个整连，缴获枪100余支及物资一部。金吴塌战斗的胜利，是指挥员决心果断，部署周密，红军和游击队紧密配合；全体指战员勇敢战斗，奋勇杀敌取得的。金吴塌歼灭战，给敌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以沉重打击，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对敌斗争的信心，为粉碎敌人“围剿”奠定了基础。

金吴塌获捷后，红三团和游击队迅速东进，进至清涧南区张家圪台。张家圪台驻守敌两个排，我军一举将其歼灭。敌得知我军进占张家圪台，急令驻薛家峁守敌一个连前往增援，当即被我击溃。此次战斗，我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共歼敌8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一部。

拔掉张家圪台后，部队进至袁家沟集结。此时，清涧地下党组织向谢子长汇报，要求部队拔掉河口镇据点。河口镇地处无定河、黄河交汇口岸，两面临河，背靠大山，地形险要。敌以一个连的兵力据守该地。妄图形成清涧、延川守敌的战略支撑点，对我游击队活动危害极大。谢子长同意地方党组织的请求，决定拔除河口镇据点，以扩大清涧苏区。其部署是，以红三团担任主攻，控制河口镇后山制高点，令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切断敌人退路，从东西两面发起攻击。

8月28日拂晓，战斗打响后，红三团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攻击部队迅速攻入河口镇，歼敌一部。余敌退进碉堡，凭借坚固工事固守据点。红三团反复组织进攻，终因缺乏攻坚器材未能攻克。之后因天下雨，部队行动不便，主动撤出战斗。据点守敌慑于被歼，随后溃逃，退缩清涧县城。河口镇遂告解放。此次战斗中，谢子长亲临前沿指挥，不幸身负重伤，师政委由张秀山继任。

河口镇战斗后，部队返回安定，途中与一队拉壮丁之敌遭遇，红军和游击队立即将其包围，一枪未放，一举俘获壮丁200多人和敌护送部队一个排。教育后，壮丁当即释放回家。此次战斗，我军缴枪20余支。

红三团和陕北红军游击队协同作战，给敌八十六师五一五团以沉重打击，共歼敌正规军300余人，毙俘敌民团数百

人，缴枪数百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保卫和发展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胜利完成了反“围剿”斗争的任务。

红三团进入陕北后，受到了陕北特委和根据地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爱护。部队每到一地，群众热烈欢迎，亲切慰问，地方游击队和赤卫军积极配合红军行动，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为红军解决给养。许多群众争先恐后为红军缝衣、烧饭、送水，铡草喂马，站岗放哨。根据群众的支持和欢迎，使广大指战员深受鼓舞，纷纷表示：“为保卫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奋勇杀敌，为陕北人民得解放，就是献出生命也心甘情愿。”陕北革命根据地军民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陕甘、陕北两地区的武装力量协同作战，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战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指挥员决心果断，部署周密；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部队发扬了连续作战的顽强精神取得的。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陕北苏区迅速扩大，各区游击队发展到20余支。9月，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第三支队分别改编为第一团、第三团。不久，第二支队改编为第二团。各团在加紧自身建设的同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为发展创建红二十七军奠定了基础。

第三节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

1934年夏，国民党十七路军六十一师杨子恒部派重兵“围剿”黄龙山土匪梁占奎部，强迫其接受改编。梁部营长郭宝珊，由于出身贫苦，从1931年开始，在陕甘边革命斗争和红军的影响下，由不伤害红军发展到掩护红军伤病员，与红

军和游击队保持友好的关系。红四十二师党委抓住这一有利条件，决心争取郭宝珊投身革命，并多次致信于郭宝珊，动员他弃暗投明。当杨子恒威逼梁部接受收编时，红四十二师也加强了对郭宝珊的争取工作，派黄罗斌等人深入郭部宣传革命道理，动员其率部参加红军。

9月，梁占奎率部前往庆阳接受杨子恒收编。当郭宝珊营行至合水县太白镇时，红二十六军派人与郭联系，并送去军需品，使郭深为感动，立即派人送信给红二十六军，表示愿意接受红军改编。刘志丹接到信后，立即派陕甘军委供给部部长马锡五再次与郭联系。10月20日，郭宝珊在庆阳县新堡（今华池县）毅然宣布起义，率本营120余人进入庆北苏区。之后，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红三团、骑兵团到柔远城南一带接应。11月10日，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正式成立西北抗日义勇军。任命郭宝珊为司令员，政委任浪花。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陶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部队改编后，为加强义勇军的建设，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派出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做政治工作。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并给义勇军战士戒烟（鸦片）治病。边区政府还发动群众送猪、羊、瓜、菜进行慰问。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切关怀，使义勇军感到了革命队伍的温暖，深感参加革命的光荣。刘志丹还专程到义勇军看望部队，宣传革命意义，使义勇军深受鼓舞。

西北抗日义勇军成立后，参加了红三团和游击队消灭地方反动武装的斗争。与红军游击队先后拔掉了五蛟、元城子据点，消灭谭世麟民团200余人，缴枪200余支（挺），解放了元城子川、五蛟川、悦乐等大片地区，使庆北根据地得到

迅速发展。

郭宝珊部的起义，瓦解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扩大了我军革命的影响，促进了对敌斗争的发展。

第四节 扩大红四十二师

1934年7月下旬，为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内党的组织建设和政权建设，陕甘边特委作出了《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提出了陕甘边区党、政、军今后的任务。指出：“红四十二师及各游击队的党组织，应成为群众的核心。扩大与巩固红军，责成第二路游击队和第三路游击队于两月内各完成组建一团红军的任务，建议红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组建一师红军的任务。”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军事干部，武装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这个决议的实施，使红二十六军和南梁根据地进入了大发展的时期。

不久，按照陕甘边特委的决议，陕甘边区红军军政干部学校在南梁荔园堡成立，刘志丹任校长（兼），习仲勋任政委（兼），吴岱峰任军事主任。军政干部学校的成立，为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培养了一批干部，对提高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校共举办了三期培训班，培训干部200余名。学校开始设在荔园堡，后迁至豹子川张岔。

1934年秋，照金苏区恢复，第三路游击队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南梁根据地的南区。相继建立平子、宁县、赤水、淳耀、富甘、中宜、底庙以及九支队、回民支队、特务队等游击支队。由于游击队的发展壮大，连续出击，使南区得到发展和巩固，建立了南区党委和苏维埃政府。9月中旬，红四十二师

党委在湫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作为南区坚持斗争的核心力量。红一团是以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所属的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一部组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连，共计 200 余人。步兵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步兵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之后又发展了骑兵连和步兵第四连。

红一团组建后，配合三路游击队参加了湫头、高窑、七阶石、麻子掌、王寨子、七里铺、赵村、直罗镇、王郎坡等战斗。消灭了固守据点的地方民团反动武装，使根据地日渐扩大到湫头、照金、小石崖为中心的正宁、淳化、耀县、宁县、中部、宜君、铜川等地区。

10 月，第二路游击队开辟了以甘泉县下寺湾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成为南梁根据地东区，拥有 8 支游击队，人数达 4000 余人。为充分发挥该游击区的作用，扩大正规红军，特委和边区军委决定抽调庆阳、保安游击队各一部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1934 年 10 月 10 日，红二团在南梁阎家洼子成立。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副团长孔令甫，参谋长王生荣，政治处主任朱奎。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队，共计 200 余人。之后又发展了骑兵排。

红二团组建后，首战旦八寨子曹俊章民团，全歼守敌 50 余人，缴枪 50 余支。之后，击溃了敌二五六旅五一二团一个营的进攻，歼敌一部。又配合红三团消灭了头道川新寨、白家屯民团。

红一团、红二团的成立和郭宝珊抗日义勇军的改编，使四十二师迅速得到发展壮大，南区的发展，东区的开辟，以

及西线庆北地区的扩大，使陕甘边游击战争，已从分散的游击区和被隔断的小块红色区域，走上了军事战略上的统一。

截至1934年11月，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已拥有五个团的建制，共计1500余人。这支革命武装，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率领下，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坚持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敢于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发展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根据地，已逐步发展成为西北红军的主力部队。

1935年的1月底，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宣告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下辖三团和一个少年先锋营。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此后，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和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相互支持，相互配合，共同战斗，为取得西北地区的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注 释

①西北根据地包含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

第五章 粉碎敌人“围剿”

巩固扩大根据地

1934年10月和1935年7月，蒋介石集团先后对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根据地军民密切配合，在以刘志丹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下，采取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战术，历经10余战，解放6座县城，将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第一节 粉碎敌人对陕甘、陕北

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1934年夏秋，敌人对陕北的“围剿”惨败后，不但地方军阀慌了手脚，连蒋介石也深感不安。1934年10月后，蒋介石亲调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队，策划对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敌人这次“围剿”采取分区“清剿”、逐区蚕食，梯次推进、逐渐收缩的方针，企图压迫红军入其包围圈，聚而歼之。

敌人投入“围剿”的总兵力为6个师30个团约5万人。其部署是：第三十五师马鸿宾部进攻南梁地区，所属3个旅7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华池，布成新月形战线，向根据地中心推进；第六十一师杨步飞部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地区，楔入南梁与照金两区之间，伺机北进

南梁，南出淳耀；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4个团，在宜君、黄陵、洛川、富县、甘泉一线，守备咸榆公路，作战略警戒；第八十六师井岳秀7个团收缩到保安、靖边、横山、榆林、佳县、神木、府谷一线布防；第八十四师高桂滋4个团由河南洛阳直抵延安、安定、延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等县，插入陕北腹地；晋军孙楚部3个旅和李生达2个旅陈兵黄河东岸，堵我东进之路。为了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1935年1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二团北上陕北，探望谢子长的伤情，交换意见，并就反“围剿”问题与陕北特委进行商讨，对统一两个特委、两支红军的领导和指挥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之后，刘志丹留在陕北，继续研究和制定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行动计划，红二团返回南梁地区。

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安定县周家峪召开联席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谢子长、刘志丹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方针、计划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会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动员令。军委在分析陕甘边、陕北革命形势后，着重分析了敌情，指出敌人此次“围剿”规模虽大，但战线广袤千里，空隙很多，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难以协调。蒋介石把自己的嫡系部队摆在第二线，驱非嫡系为先锋，互存异心。杨虎城对蒋介石早有戒心，兵至甘泉，大抵不会再向北犯。马鸿宾为保护宁夏地盘，不会冒险深入。井岳秀为求稳定其在陕北的地位，不敢露出老本。只有高桂滋气势汹汹，甘为蒋介石效命。高部虽然武器精良，但初入苏区，人生地不熟，难以施展。加上

高桂滋与井岳秀有旧怨，不可能协同作战。根据上述情况，军委提出反“围剿”的任务是集中兵力，首先打破高桂滋战线，尔后向南发展，将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反“围剿”的作战部署是：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组成西北红军，采取运动战的战术消灭敌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牵制敌六十一师，在三（水）、淳（化）、耀（县）、宜（君）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完成阻击敌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北上环县、定边、靖边，开辟新苏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向韩（城）、合（阳）一带游击，扩大政治影响，牵制敌人。红二十六军主力转至外线后，留地方游击队坚持南梁地区的斗争。军委还决定：成立“陕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区办事处”，统管清（涧）、绥（德）、吴（堡）地区的游击队，牵制北线敌人。

1935年2月21日，谢子长因病情恶化逝世，年仅31岁。为纪念谢子长，1935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党中央来到陕北后，毛主席在延安接见谢子长的亲属时，对谢子长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亲笔提词“谢子长同志，民族英雄”。

正当西北工委、西北军委领导根据地军民积极准备反“围剿”之际，敌人“围剿”已展开。

1935年初，敌高桂滋部八十四师与井岳秀八十六师衔接，构成一个由绥德、清涧至延安的分割封锁区。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乘敌兵力分散，立足未稳，在安定县南沟岔首歼高敌四九九团一个连，穿过敌防线，东渡无定河，进入清涧县。2月下旬，在高杰村袭击敌五〇一团一个连。3月上旬，

在延川县贺家湾又歼敌一个连。三战三捷，取得了同高桂滋部作战的经验。

与此同时，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师长杨森亲率骑兵团深入敌区，寻机打击敌人，破坏敌人合围计划，延缓敌人进攻速度。1935年1月，骑兵团越子午岭、过正宁、宁县，强行通过封锁线，截断西兰公路，一举攻入西兰公路长武县城，歼敌近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极大地震动了敌人，迫使国民党当局为了保护其西北交通要道，调兵遣将，加强防务。接着，骑兵团奔袭国民党环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歼敌民团200余人，缴枪200余支。然后，返回南梁根据地。2月中旬，杨森又率骑兵团东进延安，诱敌五〇一团第二营及延安民团200余人，进入高桥川口，歼敌100余人，震动了延安守敌。之后，又在延安南川三十里铺消灭民团数十人，缴枪20余支。下旬，骑兵团向宜川方向进军，先后在松树林消灭民团100余人，缴枪50余支；消灭金盆湾民团50余人，缴枪50余支；袭击甘泉临真镇，全歼民团100余人，缴枪100余支；击溃宜川云岩阻击之敌，俘敌40余人，缴枪50余支；然后转向狗头山、后九天，两地民团慑于被歼，自动交械。骑兵团两次出击，纵横敌后10余个县，打击了敌正规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牵制了“围剿”根据地的南线、西线敌人。同时，使南梁根据地东区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提高了人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

1935年1月15日，敌三十五师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另一路经固原、西峰镇、庆阳进驻六寸塬。2月21日占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城子等地，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形势下，红二团在二路游击队、赤卫

军的配合下，采取迷惑、袭扰、阻击等战术，在老爷岭一带阻击敌人达一个月之久。3月，乘敌人尚未掌握我军动向，红三团、抗日义勇军在游击队配合下，偷袭田峨岬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马殿邦团一个营，歼敌100余人，拔除了敌人据点。

此时，敌马鸿宾部一个营，进驻庆阳县六寸塬，正在修筑工事。师长杨森、政委张秀山决定在北上之前，趁敌立足未稳，奔袭歼灭该敌。4月30日深夜，部队到达六寸塬梁下的村子附近。拂晓前，抗日义勇军首先攻入村内，歼敌20余人，缴枪20余支。天亮后，部队开始攻击据守山梁阵地的敌人，红三团由东南方向主攻，骑兵团布置在左侧。红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多次冲锋受阻。战至中午，红三团再次接近敌前沿，骑兵团由左侧发起冲锋，由于地形不利，遭敌火力封锁，伤亡较大，团长赵国卿身负重伤，部队被迫后撤。因为协同不好，骑兵团后撤时冲乱了红三团的部队。加之敌主力一〇五旅赶到，趁机反击，红四十二师遂撤出战斗。红三团团长王世泰在指挥战斗时负伤，吴岱峰代理三团团长，康健民任骑兵团团长。

4月下旬，敌八十四师、八十六师各一部，以营为作战单位，步步为营，向我根据地和红军活动中心推进。4月30日，敌八十四师二五一旅五〇一团第三营进驻杨家园子。西北军委决定趁该敌立足未稳，予以歼灭。具体部署是：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担任主攻，从黄家川、玉家湾出发，向三皇庙寨进攻，夺取制高点墩儿山寨堡；令红八十四师第一团从魏家岔出发，向杨家园子西街进攻，并担负阻击瓦窑堡增援之敌的任务；令红八十四师第三团，从冯家岔出发向杨家园子东街攻击；令红八十四师第二团为预备队。

5月1日,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此时,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义勇军共有900余人,红八十四师一、二、三团有1000余人,合计2000余人,有长短枪15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当日举行了万人大会,刘志丹作了动员讲话,各团代表在大会上表了决心,部队情绪十分高涨。2日,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例以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定。3日,在玉家湾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5月6日夜,我军完成了对杨家园子的包围。7日拂晓,当部队进入杨家园子时,发现地形狭窄,兵力无法展开;敌工事坚固,不宜强攻。刘志丹果断改变计划,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向魏家岔、黄家川、冯家岔转移。杨家园子敌人见我军撤退,以部分兵力分两路追击我军,我军边打边撤。8时许,瓦窑堡之敌一个连,押送一些“政治犯”向杨家园子以西5公里的吴家堡寨子行进,进入我八十四师一团的伏击圈,全部被歼,歼敌100余人,缴枪90余支,救出了被押解的同志。

10时许,杨家园子出击之敌进占吴家寨子及其后山制高点。我八十四师第一、二团在黄家山会合后,立即向吴家寨子发起攻击。敌撤至白家园后山老虎塌、园峁子等高地。杨家园子守敌为解吴家寨子之危,倾巢西进,我军随即占领杨家园子,使敌处于我夹击之中。总指挥部抓住战机,命令各部坚决消灭这股敌人。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抗日义勇军先敌占领大小塬山制高点,从两翼向老虎塌发起钳形攻击,红八十四师第一、三团从西南侧击敌人,经过6小时激战,将敌全歼于泥泞沟,毙敌营长郭子封以下50余人,俘敌副营长以

下450余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机枪30挺。

正当部队处理战后事务时，接到游击队报告，敌五〇〇团第三营和团属机炮连护送粮饷、物资及军官家属，由绥德回瓦窑堡本部，被我游击队和赤卫军包围于马家坪一带。刘志丹当即指挥西北红军向马家坪进发。5月9日，我主力兵团及数千游击队、赤卫军在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向敌发起攻击，仅两个小时，即全歼该敌。毙敌营长左向恒以下40余人，俘敌副营长以下450余人。缴获长短枪450余支、轻机枪27挺、重机枪2挺、迫击炮2门、军需物资400余驮和大批医疗器械及药品。

红军主力兵团在3日内，三战三捷，歼敌高桂滋部两个整营又两个连约1300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军威大振。敌人受到极大震动，被迫收缩战线，将五〇〇团驻守安定老县城的第一营和延川县永坪镇的第二营撤回瓦窑堡，“分区进剿”战术宣告破产。安定县城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一座县城。

5月10日，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并对下一阶段作战的方针、计划提出建议。会议对刘志丹的报告和建议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决定我军由打高（桂滋）牵井（岳秀）转为打井牵高，主力兵团向南进击，切断高桂滋的南线，然后西进，集中兵力打击井岳秀部。西北工委要求红军再接再厉，争取5月底打通陕甘边与陕北根据地，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根据玉家湾会议精神，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首先攻打延长县。5月中旬，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兵团，进至清涧无定河边。5月20日，于张家圪台歼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连。驻苏

家岩之敌一个连渡过无定河增援，大部被我歼灭。随后，部队移驻清涧店子沟地区，摆出攻打绥德、清涧的态势。敌高桂滋部在接连被我歼灭两个多营后，嚣张气焰大减，唯恐我军北攻绥德，慌忙部署拦截。我军却秘密星夜南下，25日到达延长县大连沟一带，封锁消息，隐蔽待机。

延长县守敌为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及民团、矿警队，总计400余人。兵力少，但可以凭借工事，固守待援。总指挥部决定诱敌出城，削弱敌城防力量，以便各个击破。遂派少量部队连夜赶到距城10余公里的东壕，大张旗鼓地进行打土豪、分财产。民团团总李鸣吾以为东壕只是小股游击队，于27日晚，率130余人由县城赶奔东壕。翌日与我军接触，我军边打边撤，将李部诱至距延长县50余公里的茄子峁峁。29日拂晓，我对延长县城发起突然攻击，敌猝不及防，县城迅速被我占领，守敌全部就歼。李鸣吾发觉上当，匆匆率部返回，被我军歼灭于途中。此役，共歼敌400余人，俘延长县县长，缴获长短枪400余支、轻机枪10余挺、无线电台1部、战马170余匹及一批军用物资。驻守延川的敌八十四师五〇一团一营和民团闻风弃城而逃，延川县城亦告解放，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三座县城。此时，南线高桂滋部已失去进攻能力，只能死守绥德、清涧、瓦窑堡三个据点。

延长、延川解放后，前总决定集中兵力攻占安塞县境内的各个据点。安塞县是陕甘边、陕北两个根据地的中间地带，解放了安塞，拔掉敌据点，就可以使两个红色区域连成一片。6月10日，陕北游击队围攻安塞县高桥镇，红八十四师随后增援。16日，高桥民团向我投降。与此同时，红四十二师第三团和义勇军于13日对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发起攻击。

红三团担任主攻，以挖地道爆破的方法攻入寨内，守敌一个连弃城逃窜，红三团俘敌县长及部分政府官员。17日，刘志丹与红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共同指挥其一、二团攻打李家塌据点。在红四十二师三团配合下，于27日将这个坚固据点拔掉，歼敌100余人。至此，安塞全境宣告解放。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解放安塞后，前总得知石湾敌井岳秀部有进犯迹象，遂令红八十四师第二团返回安定，保卫工委、军委机关，调红四十二师第二团加入主力兵团。前总决定继续北进，攻打靖边县城。

靖边守敌为井岳秀部二五六旅五一三团二营，营长曲子鹏，辖3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400余人，号称井军精锐，加上地方武装，总计约600余人。前总指挥部决定以5个团的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歼灭该股顽敌。

6月28日2时许，我军到达靖边县城。拂晓开始总攻。敌人依据城墙、碉堡拼命抵抗，我攻城部队连续攻击，战至中午12时，毙敌营长曲子鹏，全歼守敌。此役共歼敌600余人，俘敌县长、民团总指挥、县党部书记等100余人。靖边成为我军解放的第五座县城。

靖边曲子鹏被歼后，震撼了周围的敌人。驻保安县城之敌井岳秀部一个营，于6月30日弃城逃跑，保安县城宣告解放，这是我军解放的第六座县城。

在一个半月时间里，我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七军一起连续解放6座县城，歼敌2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支、轻重机枪100余挺，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游击区扩大

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3000余人，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余人。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

与红军主力作战的同时，红四十二师第一、二团，骑兵团，第二、三路游击队及赤卫军，坚持以南梁为中心，四处出击，牵制敌马鸿宾三十五师、冯钦哉四十二师、杨步飞六十一师，使其不敢贸然北进，有力地支援了主力兵团集中兵力打击敌高桂滋的八十四师。

3月中旬，红二团在南梁地区完成阻击敌三十五师的任务后，按原定作战方案，迅速转移至陕甘边西北、东北区，向敌人发动进攻。4月下旬，在杨清川伏击敌警三团骑兵连获胜。5月中旬，奔袭宁塞川、五城镇，歼灭民团200余人。接着北上定边，在韩家洼摧毁敌张廷祥一个修械所。随后，南下奔袭吴起镇民团，解放了吴起镇。在两个多月的转战中，开辟了定边以东、靖边以西的广大游击区，部队也得到了扩大。

骑兵团在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的率领下，再次东进、南下，打到敌占区，切断咸榆公路，牵制敌人。5月中旬，骑兵团由黑水寺经洛河川东进甘泉、宜川，在屯石岷岷歼敌民团160余人，缴枪100余支。后接前总命令参加攻打延长。骑兵团到达时，延长已经解放，前总将缴获的100余匹战马交给骑兵团，组成了骑兵团第四连。6月初，骑兵团攻打宜川城不克，挥师南下，在洛川、宜君、白水三县交界处观音堂镇歼敌民团一部后，向澄城、合阳、韩城等县进军。先后在澄城县消灭民团50余人，在合阳甘井镇消灭民团60余人。接着奔袭韩城，筹款万余元，沿黄龙山回师洛河川下寺湾。7月上旬，骑兵团在富县羊泉与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会合，消灭黄陵县龙坊塄杨相之民团，并在富县、宜君、黄陵一带活动，消灭小

股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黄陵、宜君游击区，控制咸榆公路西侧，给敌人造成运输上的极大困难。7月中旬，在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一团返回照金地区。

敌人苦心策划的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这次胜利的一个重要的战绩，是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标志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完整形成。这是武装革命斗争在西北结出的硕果，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十六军在南北两线同时作战，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发挥了主要作用。

第二节 参加陕甘、陕北根据地

第三次反“围剿”斗争

1935年7月，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粉碎敌第二次“围剿”之后，蒋介石调兵10万之众，亲任“西北剿匪总司令”，向陕甘边、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妄图一举消灭西北红军。

敌人的部署是：东面沿黄河一线为阎锡山6个旅；北面为高桂滋、井岳秀2个师；西面为马鸿宾、马鸿逵部和东北军董英斌、何国柱部共7个师；南面为东北军王以哲4个师、杨步飞1个师和西北军一部。7月下旬，除敌八十四师、八十六师已在根据地北线外，担任南线“围剿”主力的敌六十七军已开始洛川地区集结；东线晋军5个旅于榆次地区集结，先头部队已渡过黄河，进至绥德、吴堡一带；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进驻环县。

此时，我西北红军主力和游击队只有一万余人，而且第

二次反“围剿”斗争刚刚结束，尚未进行休整和补充。但由于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丰富了对敌作战的经验，部队士气旺盛，根据地更加巩固；敌人兵力虽多，但存在着运输困难，不熟悉地形，各保实力，互不信任等弱点。

基于对敌我情况的上述判断，前总决定集中红四十二师和红八十四师，在敌部署尚未就绪之前，首先打击东线晋军，后打立足未稳的南线东北军。命令红四十二师第一团、骑兵团运动在咸榆公路两侧牵制敌人。动员根据地所有的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兵力作战。

7月上旬，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绥德三皇歼敌一个工兵营100余人。7月17日，在高家塬一带袭击敌五〇一团一营、五〇二团三营和张廷芝骑兵团，毙伤俘敌300多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机枪18挺，五〇一团团长艾杰三负伤逃跑。

8月初，刘志丹率部经清涧袁家沟、花岩市北上，先在佳县、吴堡两县交界处消灭井岳秀部一个连，继而秘密插至吴堡县东北地区，准备攻打慕家塬据点。

慕家塬位于吴堡县境内，驻有晋军二〇六旅四一二团一个连，周围筑有高墙碉堡，墙外还有深3米、宽9米的护城壕。四一二团的其余部队分别驻守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等地。前总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以红八十四师第一团偷袭慕家寨，其余分三路设伏打援。

8月10日凌晨，西北红军总指挥部调红四十二师第三团担任主攻。红三团受领任务后，立即组织了攻城突击队，准备云梯、绳索等攻城器具，察看地形，确定了攻击路线。11日，攻击开始，团长王世泰亲率100名突击队员，在火力掩

护下,沿寨东侧的一条小沟向寨墙接近,当攻到寨墙下时,敌人不断从上面扔下土制炸弹,炸坏了云梯,几次强攻均未成功。部队伤亡很大,王世泰坚决组织继续攻击,一名战士用数枚手榴弹将寨墙炸开一个缺口,部队陆续攻进寨内,将一个连守敌全部歼灭。王世泰在指挥战斗中身负重伤。12日,宋家川、辛家沟、郭家沟的敌人三路来援,当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时,我军突然发起攻击,敌顿时乱作一团,大部被我歼灭。此役,共歼敌600余人。

慕家塬首战告捷,给敌以沉重打击,敌人判断我主力部队北上神府地区,急忙在黄河两岸增兵加强防御。我前敌总指挥部利用敌人错觉,扬言北上,指挥部部队隐蔽南下,到达绥德新庄一带。此时,定仙塬守敌晋军四一二团一个营,被当地游击队赤卫军围困在城内,缺水断粮,频频告急,晋军第三旅旅长马延寿亲率第六团西渡黄河赶来救援。刘志丹当即决定围城打援,消灭增援之敌。并命令部队迅速向定仙塬逼近,缩小包围圈,使城内守敌处于绝境。

8月中旬,马延寿率第六团渡过黄河,沿黄河西岸至枣林坪。8月21日,当敌人行至四塬塔我军埋伏圈后,首先遭我红四十二师第二团的阻击。接着,红四十二师三团和抗日义勇军从石格溜咀向敌人侧击。马延寿率部用迫击炮和重机枪打出一条通道,强行向定仙塬靠拢。红一团从正面阻击敌人。在我三面夹击下,敌人被分割包围,溃不成军,欲战不得,欲逃无路,最后被压到金不拦沟道里。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在红八十四师的配合下,将敌全部歼灭。毙伤敌副团长以下2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战斗中

阎锡山派一架战斗机前来助战，被我军击伤迫降在绥德县薛家峁一带，两名飞行员被俘，这是我西北红军缴获的第一架飞机。

定仙娥战斗是西北红军战争史上的辉煌战例，它首开西北红军一战歼敌一个整团及一个直属队的作战纪录，大灭了晋军的锐气。此次战斗，我主力红军在游击队、赤卫军的配合下，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法，灵活运用阻击与迂回相结合的战术，于运动中歼灭敌人。充分体现了刘志丹的指挥艺术和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此次战斗后，晋军除留部分部队收缩到宋家川、石堆山等坚固的工事里，其余全部撤回黄河东岸。我主力红军抵安定县文安驿地区休整。

1935年9月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甘苏区庆阳、合水抵达保安县永宁山，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热烈欢迎。中共西北工委当即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命令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开往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刘志丹接到通知后，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9月17日，中央驻北方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编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下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

至此，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西北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

区，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红二十六军光荣地完成它的历史使命，同兄弟部队一道，以崭新的姿态走上新的征程，去迎接新的斗争。

结 束 语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及革命规律和特点的革命道路,组建了自己的武装——中国工农红军,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正是在这一时期,陕甘边地区和全国一样,进入了组建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在谢子长、刘志丹等同志的具体领导下,经受了无数次胜利和挫折的考验,努力克服“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关于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经过极其复杂而艰苦的斗争,终于在陕甘边组建了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并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实行战略转移,提供了立足点。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发展史,是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战争史的组成部分,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开展兵运,组织兵暴,组建革命武装(1927年10月~1931年9月)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党的“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定了用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和进行土地革命

的总战略方针。

1927年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为了贯彻“八七”会议精神，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军事运动决议案》等9个重要决议，特别强调了加强军事工作和农运工作的重要性，指出：“在西北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提出了“党到农村去”，“党到军队中去”的口号，要求党的组织深入国民党部队，组织革命的兵变，培养党的军事干部，“用各种方式武装农民……必要时亦可上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这次会议，使中央的正确路线及时地得到了具体落实，使陕西党组织在风云突变的紧急关头，统一了思想，并制定出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这一时期，中共陕西省委把瓦解敌军，变白军为红军的革命兵变，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先后在陕、甘两省组织发动了数十次起义和兵暴，在陕西、甘肃、宁夏的地方军阀部队中进行了3年多的兵运工作。虽然这些起义和兵运工作大都失败了，但它是陕甘边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的重要尝试，强烈地震撼了西北反动政权的统治基础，唤醒和教育了人民群众，锻炼和培养了党的军事干部，取得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奠定了组建工农革命武装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并于1931年9月在甘肃合水县组建了陕甘边第一支由我党独立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南梁游击队。

第二阶段：扩大红军游击队，开辟游击区，为组建正规红军部队奠定基础（1931年10月~1932年11月）

1931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中共陕西省委指示陕甘边党的组织巩固和发展现有的革命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1年10月，西渡黄河的山西晋西游击队到达陕甘

边东华池一带，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1月，两部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战斗力大大增强。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坚决执行陕西省委关于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东西出击，取得了阳坡头伏击战、旬邑奔袭战等战斗的胜利；广泛发动群众，抗粮、抗款、抗捐，打土豪分财产，组织赤卫军，使游击区域日趋扩大和巩固，陕甘游击队的力量也不断壮大，并在正宁县寺村塬成立了临时革命政权——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红军游击队的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红军游击队的政治主张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5月，陕甘游击队驰骋千里，跨越数县，在半个月内容连续作战9次，歼敌1400余人，给“进剿”之敌以沉重打击。

这一阶段虽然时间不长，但陕甘游击队积累了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为创建正规红军部队作好了组织准备，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此期间，由于陕西省委的主要领导人，认为陕甘游击队坚持在子午岭山区开展游击战争，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三次撤换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的领导人，致使陕甘游击队多次作战失利，部队也由500余人减至200余人。教训是惨痛的。

第三阶段：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创建照金根据地（1932年12月～1933年4月）

陕甘游击队建立之后，陕西省委就开始考虑尽快组建正规红军部队这个问题。1932年3月21日，陕西省委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陕甘游击队的成立、发展和取得胜利的情况。认为，

汇合农民士兵的斗争，建立陕甘新苏区，组建正规红军部队是陕西党的最迫切任务，请求中央给予番号。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报告，同意组成正规红军部队，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并对红二十六军的基本任务、战略方针、编制等诸方面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在陕西宜君县转角镇正式成立。

红二团成立后，即着手创建以陕西耀县照金为中心的陕甘新苏区。先后在陕西旬邑、淳化、耀县、宜君、铜川等地消灭大量反动民团武装及部分国民党正规军，拔除了照金周围的敌人据点；帮助地方建立起香山、照金、旬邑等数支游击队；开辟了香山、九保等红色区域，打开了建立陕甘新苏区的局面。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接着，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创建照金苏区的领导和对各游击队的统一指挥。4月5日，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照金选举成立。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形成。

第四阶段：红二团南下失利，红二十六军实行战略转移（1933年5月～1933年11月）

1933年5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根据北方各省代表联席会议精神，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错误地估计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主张红二团南下渭（南）华（县）创建新苏区。并不顾刘志丹等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强令红二团南下，结果遭到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重兵的围追堵截，

几乎全团覆没,我党经过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部队,被“左”倾冒险主义者所断送。

红二团南下后,陕西省委深感问题严重,对杜衡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为了坚持创建陕甘新苏区的斗争,7月,陕西省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8月14日,陕甘边区特委在照金陈家坡主持召开陕甘边党政军联席会议,成立了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陕甘边各革命武装。同时制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的战略方针。陈家坡会议后,临时总指挥部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取得了节节胜利,使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形势开始好转。

但是,由于红二团南下失利,国民党军队对照金苏区发动了猖狂进攻,使陕甘红军处于困境之中。

为了正确地选择可靠、理想的军事后方,确定以后的行动方针,1933年11月3日至5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议在总结过去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创建以甘肃华池县南梁为中心的陕甘新苏区,开辟陕北安定、甘肃南梁、陕西照金三个战略区,建立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一、二、三路总指挥部。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的游击战争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第五阶段: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1933年11月~1934年11月)

1933年11月8日,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甘肃合水县莲花寺正式组建,下辖两个团。同时建立了中共四十二师党委。12月,第二路游击队总指挥部成立。此时,创建中心

苏区的工作全面展开。经过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南梁地区广大贫苦农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群众武装普遍建立。为了进一步扩大主力红军部队，加强党对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领导，1934年5月28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决定加强陕甘边区特委的工作，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7月，陕甘边区特委作出了《陕甘边区特委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对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的部署；提出了“为扩大与巩固部队而斗争”的口号，要求第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完成组建一个红军团的任务。并责成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后方开设军事政治学校，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由于陕甘边区特委对军队建设采取了战略性措施，使红二十六军进入了大发展时期。

1934年9月，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组建，恢复了照金苏区，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南区。10月，红四十二师第二团组建，并开辟了以甘泉县下寺湾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发展为根据地的东区。同时，在南梁以西开辟了庆北苏区。10月20日，陕西黄龙山土匪梁占魁部郭宝珊营率部起义，投奔红军，被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此间，红四十二师已拥有5个团的建制，兵员近千人，游击队也发展到1500余人，赤卫军扩大到18个大队，实现了三位一体的军事体系。在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苏区周围形成了东、西、南三个稳定的战略区。所以，当国民党当局调动8个团的兵力，对陕甘边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时，红二十六军进退自如，迂回在广大地区，使“围剿”之敌不能与我军决战。而我军却避敌锋芒，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人。经过大小战斗30余次，歼

敌 3000 余人。特别是西华池一战，开创了陕甘边军事斗争中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发展和壮大，促进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1934 年 11 月 7 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正式选举成立。它标志着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已经形成。

第六阶段：粉碎敌人“围剿”，实现陕甘、陕北两根据地的统一（1934 年 12 月～1935 年 6 月）

随着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迅速发展，两块根据地党、政、军实行了统一领导，1935 年 2 月 5 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陕甘红二十六军和陕北红二十七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加快了陕甘、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的步伐。

西北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使蒋介石惊恐万分，调动陕、甘、宁、晋、绥 5 省军阀部队五六万人，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围剿”。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奉命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协同作战，打击北线之敌，然后向南推进。5 月 1 日，前敌总指挥部成立。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向延川、延长、靖边、保安等地发起进攻，在运动中调动敌人，继而各个歼灭；红四十二师第一团、第二团和二、三路游击队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牵制了国民党 3 个师的兵力，拔除敌人据点 50 余个，歼敌 1000 余人，有力地配合了外线作战；骑兵团东进南下，切断咸榆公路，袭扰西兰公路，震惊了西安。经过 5 个月的英勇奋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 6 座县城，歼敌 2000 余人，在

20多个县建立了革命政权，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了一片，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第七阶段：粉碎敌第三次“围剿”，编入红十五军团（1935年6月～1935年9月）

1935年8月，中央红军胜利通过草地后，经甘肃直向陕甘苏区挺进。蒋介石集团阴谋使中央红军北上无立足之地，调集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10万余人，向陕甘、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的“围剿”。西北军委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案。在绥德、吴堡一线，击溃阎锡山部2个旅，迫其退回山西，初战告捷。并在定仙娥战斗中，创造了“围城打援”的光辉战例。

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六军从组建到编入红十五军团，经历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它从成立那一天起，就处在白色统治之中，多次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也同样受到党内“左”倾路线的危害。但南方其他根据地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后都丧失了，而它和陕甘边根据地不仅存在而且有所发展和壮大。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条：

一、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红二十六军稳固发展的重要基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武装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普遍规律。刘志丹等同志从3年兵运工作失败的沉痛教训中认识到，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小70多次的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

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但是，在哪里建立根据地，开始并不一致，加上“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曾走过不少弯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

早在陕甘边武装斗争初期阶段，刘志丹等领导人，就在子午岭的南梁一带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又因为他们是在陕甘边区土生土长，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认为，南梁地区地域辽阔，沟壑纵横，梢林密布，距国民党统治中心城市较远，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群众易于发动，为创建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地理优势和社会基础，较早地提出了开辟南梁根据地的设想。刘志丹等人的这种分析和认识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在陕甘边以后的斗争中，刘志丹等领导同志一贯坚持了这一主张。这一正确观点，一次又一次地被杜衡否定，极力主张红军主力向南发展，在关中平原建立根据地，造成了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苏区失守的严重后果。

1933年7月，陕西省委遭到破坏，杜衡投敌叛变，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对陕甘边武装斗争的束缚和影响，使陕甘边党的组织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问题。刘志丹等人的正确观点，终于为大多数人所认识，为陕甘边党的组织所接受。包家寨会议作出的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的正确决策，使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建设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也是陕甘边武装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陕甘边党组织摆脱“城市中心论”的干扰，掌握土地革命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特点和战争持久性的规律，在陕甘边的广大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得到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经过艰苦的探索和顽强

的斗争，游击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为西北地区的主力红军；小片游击区变为稳固的红色区域，由一个中心苏区，发展到东、西、南三个战略区，最后连片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使红军和游击队有了可靠的后方依托。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是西北最早的根据地，也是全国最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二、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克服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影响，是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根本保证。

革命战争要取得胜利，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最主要的条件。陕甘边的武装斗争从一开始，就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下进行。在前期阶段，陕西省委从陕甘边游击战争形势发展的实际出发，适时地把斗争的形式由发动“兵暴”的兵运工作，变为建立红军游击队、组建正规红军，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陕甘边区的游击战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1932年初至1934年下半年，从全党来说，是红军遭受损失最严重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者，不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政治路线，还推行了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这种错误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陕甘边的武装斗争。陕甘边武装斗争的中期阶段，实际上就是正确主张与错误领导之间斗争的阶段。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坚决执行中央的决议，开辟了照金苏区。随着形势的发展，以杜衡为代表的省委领导人头脑开始发热，不顾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实际，作出了开辟以三原为中心的苏维埃区域的决定。这一错误决定，不仅受到了红二十六军多数同志的反对，而且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纠正：

“夺取大城市截断渭河流域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和游击队能胜任的。”使红二十六军避免了一次“左”倾冒险行动。但是，杜衡并没有放弃“左”倾错误的领导，仍然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在西安附近建立根据地，造成红二团南下失败，照金苏区丧失的惨痛教训。

1933年7月，由于杜衡投敌叛变，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从某种意义上讲，陕西省委的破坏，结束了“左”倾错误对红二十六军的干扰。此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自觉地担负起领导陕甘边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重任。先后召开了陈家坡、包家寨、寨子湾、阎家洼子等重要会议，彻底批判和清算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克服和纠正了因红二团南下失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的认识达到了统一，在斗争中形成了一个坚定的领导核心。同时，制定了一条服务于政治路线的军事路线，使红二十六军按照无产阶级的建军路线、建军原则去发展，为实现党的纲领、路线和任务而积极开展斗争。陕甘边党组织充分利用敌人的弱点和己之优点，建立了正规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军事体系，终于把陕甘边根据地的中心放在了南梁地区。

陕甘党的组织中，有一批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同“左”倾错误作斗争的领导骨干，刘志丹是其中的杰出代表。194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有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与西北实际相结合，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

斗争。”这不仅是对刘志丹本人的高度评价，也是对陕甘地区党组织的充分肯定。这就是红二十六军存在、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没有丧失的内在原因。

三、制定正确的策略和政策，是红军存在和壮大的重要条件。

土地革命期间，党中央把进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重点放在了长江以南。这样，在远离党中央的西北地区，就不可能及时、直接得到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因此，在陕甘边组建工农红军和创建根据地就相当困难，探索的道路也就更加曲折。

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虽然意识到抓革命武装的重要性，但通过什么途径，在什么地方组建革命武装，还在探索之中。以谢子长、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兵运工作屡遭失败后，认识到利用军阀部队“借鸡下蛋”是行不通的，必须准备条件组建属于工农群众自己的、独立的武装。陕甘边党组织抓住当地既无工业、又无产业工人的特定环境，首先把依靠兵运工作骨干，改造农民武装，组建农民游击队，作为组建红军的主要方式。二是注意改造绿林武装，认为，对绿林武装应进行阶级分析，其中多数是贫苦农民，只要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就可以争取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对“游民无产者”既利用他能勇敢战斗的一面，又注意引导他们，防止有破坏性的一面。三是紧紧依靠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农民阶级（主要指贫农和中农），使之成为红军游击队的主体。按照上述原则，陕甘边党组织把建立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军队作为建军宗旨，不断加强军队建设，健全了政治工作制度，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逐步纠正了部队中存在的

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非无产阶级思想，使红二十六军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在游击战争中坚持统一战线，是陕甘边党组织和红二十六军采取的又一重要策略。当时在陕甘边区内存在着诸多的割据势力，刘志丹等领导人为了使红军和游击队能够在这种环境下存在和发展，采取各种方法，尽最大努力，同政治上保持中立、不与红军对垒的割据势力达成互通情报，互不侵犯，和平共处的协议。同时对阶级出身好，同情革命的人，积极争取，使其站在人民一边，达到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目的。因此，红军和游击队争取到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孤立了反动势力。陕甘边党组织和军队采取的上述策略，是弱小的红军得以生存并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

四、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红二十六军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重要因素。

“十年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见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陕甘边区红军初创时只是一支弱小的武装，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剿”和“围剿”，生存与发展主要是通过开展游击战争而实现的。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陕甘边区特委明确提出在子午岭山区坚持游击战争，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战略原则和“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红二十六军深入敌后，依托有利地势同敌人周旋，“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这些战略战术反映了红二十六军进行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也是红二十六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重要原则。

在游击战争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把握战机、创

造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击其薄弱部位，是红二十六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又一原则。在战斗中，广大指战员发扬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克服困难，勇敢战斗，指挥员决心果断，部署周密，为取得战斗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十六军从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游击战、运动战、歼灭战，并创造了“围城打援”的战术典范，使“围剿”之敌在我军的调遣之中。尽管蒋介石集团集中数万兵力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进行多次“围剿”，妄图把弱小的革命武装消灭掉，但在我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面前，均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大事记

(1927年10月~1935年9月)

一九二七年

10月12日 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在驻陕北清涧县的国民党兵岳秀部石谦旅组织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12月 清涧起义部队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决议，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阁要任参谋长，全支队总计100余人。

一九二八年

5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贯彻党的武装起义方针，决定在渭南、华县发动农民和部分西北军举行武装起义。在中共陕东特委的领

导下，渭南东塬 1000 多名群众举行暴动。10 日，国民联军李虎臣新编第三旅旅长许权中（中共党员）宣布起义，奔赴渭华一带，与暴动农民会合。

5 月 12 日 陕西旬邑县党组织发动了农民起义。起义部队在旬邑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许才升任政府主席，程永盛任红军总指挥，并将起义队伍编为三个连。

5 月 16 日 渭华起义部队在高塘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会。会上宣布了省委的命令，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军委下辖总司令部，总司令唐谢，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总顾问许权中。

10 月 8 日 中共中央致信陕西省委，指出：“过去的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此后，中共陕西省委把开展兵运工作、瓦解敌人、发动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并把兵运工作的重点逐步转向陕甘边地区。同时派谢子长、刘志丹等一批同志到陕西、甘肃、宁夏一带从事兵运工作。

一九二九年

1929年春 刘志丹与保安县地下党组织一起发动群众，开展斗争，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

6月22日 中共中央通过《陕西问题决议案》指出：陕西党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士兵中的工作，积极发动士兵中的日常生活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以夺取广大的士兵群众，使与工农斗争结合起来。”“同时可打入农村中现有的武装组织及秘密结社内（如民团、红枪会、哥老会等）抓取下层群众，领导其参加农村斗争，渐渐使之变成农民自己的武装力量。”根据中央的决议，中共陕西省委把瓦解敌人，组织革命兵变，作为这一时期的中心任务。

一九三〇年

1930年春 谢子长、刘志丹前往陕、甘两省交界地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

8月 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主动辞去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的职务，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陕甘边的武装斗争。

10月1日 刘志丹带领一部革命武装，在甘肃合水县

太白镇袭击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击毙敌正、副营长，缴获长短枪 50 余支、骡马 10 余匹。并组建起一支四五十人的革命武装，活动在保安、安塞一带。

一九三一年

刘志丹率部向甘肃陇东一带活动，一路上积极宣传革命思想，使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三股绿林武装 300 余人投身革命。部队在合水县固城川麻义村进行了整编，刘志丹任总指挥。

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山西孝义县楼底村成立。拓克宽任大队长，黄子文任政委，阎红彦任副大队长，一中队队长阎红彦（兼），二中队队长白锡林，全队共计 40 余人。

6 月 刘志丹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与甘肃军阀陈珪章谈判，收编土匪李培霄武装获得成功，刘志丹被任命为陈部第十一旅旅长。

7 月。 刘志丹认真总结兵运工作，毅然来到陕甘边地区桥山山脉子午岭山区，准备建立革命武装。

8 月 10 日 陕西省委在《接受中央来信与陕西党目前中心政治任务及中心工作决议案》中，再次强调：“组织革命兵变与农民斗争相结合，以开展革命的游击战争。”“加强士兵工作，

党必须加紧发动士兵群众的辅助组织（如兄弟团），组织革命士兵委员会，积极准备和组织革命兵变，对于自发的兵变更要一刻不放松的去领导，以开展游击战争。”

9月 刘志丹、马锡五在甘肃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集合旧部杨培胜、赵连璧、贾生财三支队伍进行整编。组织起陕甘边第一支由我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南梁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胜，副大队长白冠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全队共计300余人。

9月4日 晋西游击队一部30余人西渡黄河进入陕北。部队到达安定县南沟岔进行休整，选举阎红彦任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吴岱峰任副大队长。

9月10日 晋西游击队首战安塞县平桥之敌告捷。

9月11日 晋西游击队在安条岭击溃了军阀井岳秀部高雨亭营及民团300余人，随后收编了师储杰、杨琪、杨鼎三股绿林武装，改编为一个支队，共计300余人，师储杰任队长。

10月底 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在南梁林锦庙胜利会合。成立新的游击队队委会。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胡廷俊、白锡林任委员。

11月 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来到南梁，领导会师

部) 根据胡宗南部队。上高安署城西北第二十四营，由
前12月，会集陕西省委派荣子卿到游击队传达了省委坚
一决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的指示，要求部队
“。在整训后南下，并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反帝同
本同盟军。在正宁县，刘志丹

支三队主贾，整训后，由甘南回陕，
由一支队以甘南回陕，一九三二年

志丹，由甘南回陕，一九三二年，由甘南回陕，
斗1月初，在“西北反帝同盟军”在甘肃正宁县柴桥子村
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
丹、参谋长杨重远。部队编为两个支队。第
一支队队长师储杰，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
警卫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
长杨鼎，副大队长吴岱峰；第三大队队长雷
恩钧，副大队长陈玉清；警卫队队长白锡
林。第二支队队长刘志丹（兼），参谋长朱

理凯，军需马锡五，下辖三个大队和一个警
卫队。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
范；第二大队队长杨培胜，副大队长白冠
五；第三大队队长贾生财，副大队长谷聚
山；警卫队队长刘丕杰。共计 700 余人。

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西北反帝同盟军在
甘肃正宁县三嘉塬锦章村召开军人大会。
李杰夫代表省委宣布了改编命令。将西北
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
队(简称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

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

2月13日 陕甘游击队攻占职田镇。

2月15日 陕甘游击队在旬邑县阳坡头设伏，歼敌300余人。

3月19日 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南塬群众的配合下，攻打山河镇，因向导迷路，联络失误，未果。

3月20日 陕甘游击队进至寺村塬，将群众武装改编为赤卫军，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

3月21日 陕西省委在给中央的《游击队逐渐壮大情况及准备成立正式红军的请示》中提出：陕甘边武装斗争在“军事上必须准备成立正式红军”，要求中央给予正式番号。

4月20日 中央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新苏区的决议》，批准了陕西省委的请示报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4月21日 陕甘游击队奔袭旬邑县城，一举突入城内，歼敌300余人。这是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4月下旬 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并撤销了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将部队编成三、五两个支队。刘志丹任第三支队队长，吴

大个四联下，斗争 岱峰任参谋长；阎红彦任第五支队队长，
吴升海任第二支队，杨重远任参谋长。

斗争 5月10日 敌人调集重兵对游击队实行分路“进剿”，
省委急令游击队北撤，在旬邑县清水塬集
结，根据斗争需要恢复了陕甘游击队总指
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李杰夫为
政委。

斗争 5月15日 陕甘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歼敌五一
团两个连。

斗争 5月17日 陕甘游击队在旬邑杨家店凤凰山再歼敌五
一一团两个连，之后奔袭焦家坪，一举将守
敌全歼。

斗争 5月27日 陕甘游击队与尾追之敌孙友仁警卫团和冯
钦哉部在富县吉子峒展开激战，突出重围。

6月初 陕甘游击队转至郿县宁武镇，歼敌一个团
指挥所。之后，攻打临镇未克，部队转入韩
城，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了自卫军。

二章 6月底 陕甘游击队在韩城作战失利。部队转移到
甘肃宁县麻子掌、梁掌堡一带。队委会召开
会议，纠正了悲观失望情绪，统一了思想。
决定免去刘志丹总指挥职务，推选阎红彦
担任总指挥。同时，将三、五两支队编为两
个步兵大队和一个骑兵大队。一大队队长
高山保，政委黄子文；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
志丹；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

吴 7月8日 在共产党员高鹏飞、曹胜荣、杨林等组织领

领导下，在甘肃合水县西华池成功地发动了国民党新编第十一旅特务营两个连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高鹏飞任队长，阎润品任政委。西华池起义是我党在西北地区兵运史上的首次胜利。

7月23日 陕西省委派李艮来到陕甘游击队巡视工作，传达了省委关于“为实现创建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边新苏区和游击队的工作”的指示，并担任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不顾大敌当前，在五顷塬强行分配土地，命令部队打阵地战，攻坚战，致使游击队遭受严重损失。

8月30日 谢子长再次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9月12日 陕甘游击队奔袭照金，一举歼灭富平、同官、耀县民团400余人。

9月下旬 陕甘游击队到达南梁、二将川一带活动。后北上攻打保安，未克。

12月初 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陕甘游击队开往宜君县杨家店子集结，准备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12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选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的指示，派杜衡到陕甘游击队，着手进行红二十六军的筹建工作。

12月22日 陕甘游击队在杨家店子召开党员大会及战士代表会，会议由杜衡主持，他在讲话中诬

蔑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领导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土匪路线”的错误，并撤销了他们四人的职务。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刘志丹被留在游击队继续工作。谢子长、阎红彦离队去上海受训。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在宜君县转角镇（现归旬邑县）召开军人大会，举行改编授旗典礼。杜衡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红二十六军政委兼二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郑燕清）任团参谋长，刘志丹任团政治处处长，杨重远任团参谋处处长，刘约三任团经理处处长，杨琪任团管理处处长，师克寿任共青团团委书记。全团共200余人。

12月27日，红二团攻打焦家坪，消灭宜君县民团60余人，缴枪60余支。

一九三三年

1月初，红二团进至耀县香山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革命思想。并将香山寺院的粮食分给了饥民。由杜衡提议，焚毁了香山寺。

1月18日，杜衡错误决定部队攻打庙湾玉山民团。由于对敌情估计不足，未能熟悉地形，致使战斗失利。战后杜衡撤销了郑毅的参谋长

职务，任命刘志丹为参谋长。

3月8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成立，金理科任特委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军委书记。

3月中下旬 部队转入外线作战。首先，攻打了铜川县的金锁关，消灭民团30余人。尔后，进入三原县武字区，歼敌一个骑兵排。

4月5日 在红二十六军配合下，由特委主持，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

5月下旬 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十六军党委在耀县北梁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汪锋、

秦武山等。会议重点是讨论边区工作和下一步的行动计划。李杰夫提出向北发展；刘

志丹提出在陕甘边建立根据地；杜衡提出

南下渭华，建立根据地。最后杜衡凭借职权，强制会议通过了部队南下渭华的错误决定。

5月29日 全军在北梁召开南下动员大会，部队开始南下，当天下午，行至淳化县桃渠堰遭敌袭击。经过激烈战斗，歼敌8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

5月30日 部队来到三原县二台子，同渭北游击队召开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汪锋、刘志丹、王世泰、黄子祥等。会上，杜衡强

令部队尽快南渡渭河。

5月31日拂晓，部队离开了二台子，行至三原长塄，配合渭北游击队击败当地豪绅请来的敌富平张德润民团，于黄昏时撤出战斗。杜衡提出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指任汪锋代理政委。之后，杜衡只身离队，部队继续南下。

6月1日，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阻止红二团南下。袁到三原后同杜衡相遇，遂在该县民教馆召开紧急会议。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决定由赵伯平通知高陵县党支部阻止部队渡河，并派黄子文在高陵境内拦截部队。当黄子文到达高陵后，部队已渡过渭河，无法挽回。

是日，部队到达渭河边，我军一枪未放，智取渡口，缴敌枪10余支，并俘敌民团团总薛兆兰。

6月4日，部队进入箭峪沟，遭到敌人猛烈袭击，由于寡不敌众，部队被敌冲散，失去联络。

6月7日，红二团进至青岗坪休整。

6月15日，红二团到达张家坪。

6月16日，红二团党委在张家坪村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决策。会议尚未结束，敌一个旅和地方民团趁大雾笼罩前来偷袭。部队迅速组织突围。由于敌我双方力量悬殊，我方受挫，战斗失利，部队溃散。刘志丹带领

一部向蓝桥一带突围；汪锋带领部分战士向野竹坪、葛牌等地突围；王世泰带领部分战士向两岔河一带突围。

7月 陕西省委决定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团。

7月21日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驻耀县骑兵团，在团长王泰吉率领下宣布起义，被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指挥，杨声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五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郑子明，二大队队长任建民，三大队队长张龙韬，四大队队长周德民，五大队队长谈国帆，每个大队辖一个民团中队。共计4000人。

7月24日 根据陕西省委的决定，红四团正式成立，黄子祥任团长，杨森任政委，李天保任参谋长，下辖三个连，共120余人。

7月28日 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被捕，随即叛变。杜衡带领特务到处捉捕地下党员。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

8月上旬 红四团撤离渭北根据地中心区域心字区、武字区，北上照金。

8月14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会议。会议对陕甘边武装斗争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讨论。通过了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决议，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制

定了不打大仗打小仗，积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巩固和扩大照金根据地的作战方针。

8月下旬 红四团向东出击，先后在庙湾消灭民团一部，在高山槐消灭耀县雷天益民团100余人，缴获武器一部，在让牛村消灭耀县民团一部，在柳林消灭民团数十人。

9月初 红四团向西出击，在彬县龙马、高村、柏子坡一带消灭民团100余人。尔后转入正宁金村庙一带，消灭地主武装一部，缴获长短枪10支及部分物资。

9月中旬 临时总指挥部率部队南下攻打旬邑县政府所在地张洪镇。歼敌县长以下160余人。

10月4日 刘志丹、王世泰、黄子文、曹士荣回到照金。

刘志丹任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王世泰任红四团二连连长，黄子文被派到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工作。

10月16日 国民党第十七路军孙友仁团及民团数千人，配属炮兵，向照金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军被迫撤离薛家寨。

10月18日 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部攻克合水县城，毙伤俘敌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

10月28日 我军进至庆阳县毛家沟门地区，重创敌赵文治团，共毙俘敌200余人，缴枪200余支（挺）。

11月3日 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和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期三天。会议作出决议，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

11月8日 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在莲花寺正式成立。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红三团、红四团、政治部、供给处和直属警卫连。共计300余人。红三团由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 and 红四团少年先锋队改编组成。团长王世泰，政委李映南，下辖三个连，一连连长赵国卿，二连连长陈学鼎，指导员张邦英，少年先锋连连长王有福，全团共计200余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李志柏，二连连长高占胜，共计100余人，战马60余匹。同时，师、团成立党委，连队建立党支部，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杨森兼任师党委书记。

11月中旬 红四十二师进入宜君县杨家店子，一举歼灭敌一个整连，毙俘敌120余人，缴枪120余支（挺）。

12月初 在红四十二师的配合下，地方党组织先后在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川等村将农民、手工业者、妇女组织起来，组建了农民联合会。同时，新组建了南梁、小河沟、荔园堡、豹子川、东华池五个赤卫大队，共计1000

是木合安委...余人。
一九三四年

1月上旬 红四十二师南下，帮助三路游击队扩建游击区。师长王泰吉经党组织批准，前往敌占区开展兵运工作。红四十二师师长由刘志丹接任。不久，王泰吉在淳化县通润镇被旧部出卖被捕，押往西安，在敌人面前视死如归，英勇就义。

是月，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廉家砭召开师党委会。会议对高岗破坏群众纪律，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和处理，决定撤销其师政委职务，调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政委。同时任命杨森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

2月 国民党反动当局调集8个团的兵力，对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

3月上旬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由南梁出发，从宁县、正宁南下，迅速进入照金以北地区。

3月29日 红四十二师袭击了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驻地高桥，俘敌区长以下30余人，缴获枪30余支和大批给养物资。嗣后，对元城发起攻击，红三团一举攻占元城街道，消灭谭世麟民团一个连，毙俘守敌100余人，缴获枪100余支和部分军用物资。然后师主

于当夜调兵直扑李家梁子，又歼谭世麟一个骑兵连，缴获枪 50 余支、战马 50 余匹。

4 月 2 日，红四十二师在西华池全歼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子恒部王子义团两个整营另一个机炮连，共计 600 余人，缴获步枪 600 余支、重机枪 2 挺、迫击炮 2 门、弹药数十箱、战马 50 余匹。

5 月初，红四十二师进入南梁，进至三里塬歼敌两个连，缴获枪 100 余支（挺）。战斗中师政委杨森负伤，张秀山继任师政委，骑兵团团长由赵国卿继任，政委由高锦纯继任。之后，在高凤坡、和尚塬、瓦子川连续作战，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5 月 28 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荔园堡召开会议，会议总结了反“围剿”斗争中的经验教训；调整了各级领导，加强了红四十二师和游击队的各级领导，决定加强陕甘边区特委的工作，成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张秀山任特委书记，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7 月初，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

7 月 18 日，总指挥谢子长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和 200 余名赤卫军南下陕甘边，同红四十二师在南梁会合。

7 月 28 日 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陕北特

工委和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师长杨森代表红四十二师党委汇报了建师以来部队的发展、根据地的建设和红四十二师今后发展的方针等情况，同时对根据地建设应制定的政策提出了建议。与会多数同志肯定了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认为红四十二师提出的战略方针符合实际，并得到了会议的通过。会议决定红四十二师派红三团北上，协助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的职务，任命谢子长为红四十二师政委，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由贺晋年接任。8月18日，师政委谢子长指挥红三团和游击队攻打进犯金吴塌守敌。红三团在团长王世泰的率领下，一举攻入村内，经激烈战斗，共歼敌两个整连，缴获枪100余支及物资一部。9月19日，红四十二师党委在湫头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作为南区坚持斗争的核心力量。红一团是以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所属的四支队、直属特务队为基础，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一部组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下辖两个连，共计200余人。步兵第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秉坤；步兵第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

10月10日 第二路游击队开辟了以甘泉县下寺沟为中心的大片红色区域。成为南梁根据地东区，拥有8支游击队。为充分发挥该游击区的作用，扩大正规军，特委和边区军委决定抽调庆阳、保安游击队各一部在南梁阎家洼子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二团。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副团长孔令甫，参谋长王生荣，政治处主任朱奎。下辖两个步兵连、一个少年先锋队，共计200余人。

10月20日 国民党集结大量兵力，向黄龙山进剿，郭宝珊营随敌向甘肃庆阳进发。在红三团的配合下，该部在庆阳毅然宣布起义，接受改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1月10日，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该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任命郭宝珊为司令员，任浪花为政委。下辖三个大队，一大队队长陶荣启；二大队队长王东来；三大队队长杨茂堂。

11月4日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等领导机关。并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创造新苏区，深入土地革命和武装群众等问题的决议案。

11月7日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刘志丹当选为陕甘边区革命军

事委员会主席；朱志清当选为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

一九三五年

1月2日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越子午岭，过正宁、宁县，强行通过封锁线，截断西兰公路，一举攻入西兰公路重镇长武县城，歼敌近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筹款数万元、棉布数百匹，极大地震动了敌人，迫使国民党当局为了保护其西北交通要道，调兵遣将，加强防务。

1月上旬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二团北上陕北，探望谢子长的伤情，交换意见，并就反“围剿”问题与陕北特委进行商讨，对统一两个特委、两支红军的领导和指挥等重大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2月5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岭召开联席会议。与会同志经过认真讨论，一致同意谢子长、刘志丹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方针、计划的建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惠子俊任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

会后，西北军委发布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

3月下旬 红三团、抗日义勇军在游击队配合下，偷袭

田岷岷守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马殿邦团一个营，歼敌100余人，拔掉敌人据点。

4月21日 红二团在南梁地区完成阻击敌三十五师的任务后，按原定作战方案，迅速向陕甘边西北、东北地区移动，向敌人发动进攻，在杨清川伏击敌警三团骑兵连获胜。

5月1日 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三团、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

5月2日 西北军委颁布了军事纪律、政治纪律、战地动员条例以及处决土豪劣绅等一系列规定。

5月3日 在玉家湾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5月9日 西北主力红军及数千游击队、赤卫军在前敌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在马家坪全歼敌八十四师五〇〇团一个营和一个机炮连。

5月10日 中共西北工委在玉家湾举行会议，刘志丹代表前敌总指挥部作了军事形势的报告，并对下一阶段作战的方针、计划提出建议。

5月中旬 刘志丹率红军主力，进至清涧无定河边。

5月20日 红军于张家圪台歼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一个连。

5月29日 红军对延长县城发起突然攻击，守敌猝不及防全部被歼，县城迅速被我占领。

6月17日 刘志丹与红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

志共同指挥其一、二团攻打李家塬据点。在红四十二师第三团配合下，至27日将这个坚固据点拔掉，歼敌100余人。安塞县全境宣告解放。陕甘边、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6月28日 我军到达靖边县城，拂晓开始总攻，至中午全歼守敌600余人，县城解放。

6月30日 保安守敌弃城逃跑，县城宣告解放。

7月初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绥德三皇庙歼敌一个工兵营100余人。

7月上中旬 红四十二师骑兵团在郿县羊泉与红四十二师第一团会合，消灭中部县龙坊塬杨相之民团；在郿县、宜君、中部县一带活动，消灭小股敌人，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宜君游击区，控制咸榆公路西侧，给敌人造成运输上的极大困难；在白水、澄城、韩城一带完成牵制敌人的任务后，骑兵团返回下寺湾，红一团返回照金地区。

7月17日 刘志丹率红四十二师第二、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红八十四师在高家塬袭击敌五〇一团一营、五〇二团三营和张廷芝骑兵营，毙伤俘敌3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机枪18挺，五〇一团团长艾杰负伤逃跑。

8月11日 红四十二师对慕家塬守敌发起进攻，歼敌600余人。战斗中红三团团长王世泰负重伤。

- | | |
|-------|---|
| 8月21日 | 前敌总指挥部命令西北主力红军南下，主动打击冒进而战斗力不强的晋军。选择定仙塬为战场，围点打援。经过3个小时的战斗，将敌全部歼灭，毙伤敌副团长以下200余人，俘虏1000余人，缴获八二迫击炮6门、重机枪12挺、轻机枪50余挺、长短枪1000余支及大批军用物资。战斗中阎锡山派一架战斗机前来助战，被我军击伤迫降在绥德县薛家塬一带，两名飞行员被俘。 |
| 9月9日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甘苏区庆阳、合水县抵达保安县永宁山，受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的热烈欢迎。中共西北工委当即发出《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并命令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开往延川县永坪镇与红二十五军会师。刘志丹接到通知后，亲自起草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 |
| 9月17日 | 中央驻北方代表团在永坪镇召开中共西北工委和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政治部副主任。红二十五、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七十八师师长杨森，政委张明先，下辖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 |

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

之一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六村塬进攻战斗	1932.1.8	甘肃省庆阳县境	甘军警备第十三师	西北反帝同盟军	歼敌两个连
阳坡头伏击战斗	1932.2.15	陕西省旬邑县境	陕军警卫团、地方民团各一部	陕甘地区红军游击队	歼敌两个连及民团一部，俘300余人，缴枪近400支(挺)
旬邑奔袭战斗	1932.4.21	陕西省旬邑县境	陕军警卫团、地方民团各一部	陕甘地区红军游击队	歼敌两个连及民团一部，俘300余人，缴枪近400支、子弹1万余发
陕甘边红军反“进剿”作战	1932.5.15—31	陕西省宜君、洛川、宜川等县境	第八十六师	陕甘地区红军游击队	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挺)、弹药2万余发，俘马数十匹
照金奇袭战斗	1932.9.12	陕西省耀县境	董平、同官、耀县民团	陕甘地区红军游击队	歼敌400余人，缴枪300余支
焦家坪奔袭战斗	1932.12.27	陕西省宜君县境	宜君县民团一部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	全歼民团
渭南、华县地区战斗	1933年5月29—6月上旬	陕西省渭南、华县、渭南、蓝田等县境	陕军警备等部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	红军大部被敌冲散，少数人员返回苏区
合水城袭击战斗	1933.10.18	甘肃省合水县境	陕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1个连	红军第四十二师第四团	歼敌1个连及民团一部，俘敌十人，缴枪100余支(挺)
西华池进攻战斗	1934.4.2	甘肃省合水县境	陕军警备第二旅第五团主力	红军第四十二师，游击队	歼敌一个团大部

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

战役战斗名称	作战时间	作战地区	作战对象	我军参战部队	作战结果
陕北红军反“围剿”	1934. 8. 18	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清涧等县境	第八十六师第五一五团	红军第四十二师第三团、陕北苏区游击队	歼敌约两个连
马家驹进攻延安战斗	1935. 5. 9	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境	第八十四师2个营	红军第四十二师一部、第八十四师、西线抗日义勇队、陕北苏区游击队	占领安定城, 歼敌2个营又1个连
李家驹进攻边区战斗	1935. 5. 29	陕西省延长县境	第八十四师1个连及民团		占领延长城, 歼敌1个连及民团共400余人, 缴枪400余支(挺), 战马170余匹、电台一部
李家驹进攻边区战斗	1935. 6. 17—27	陕西省安塞县境	安塞民团	红军第四十二师一部、第八十四师、西线抗日义勇队、游击队	占领安塞, 全歼民团, 缴枪200余支。
薄边立暨战	1935. 6. 28	陕西省清涧县境	第八十六师一个营及县警备队		攻占清涧城, 歼敌一个营及县警察, 缴枪500余支(挺)、火炮5门
高家驹战斗	1935. 7. 17	陕西省绥德县(今子洲县)境	第八十四师2个营及张廷芝骑兵营		歼敌300余人, 缴枪300余支(挺)
高家驹进攻战斗	1935. 8. 11	陕西省吴堡县境	晋军第七十二师第二二〇六旅第四一二二团	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师一部	歼敌4个连
定仙堡进攻战斗	1935. 8. 21	陕西省绥德县境	晋军第三旅第六团	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	歼敌一个团, 共缴伤俘敌1200余人, 缴长短枪1000余支, 机枪60余挺, 迫击炮6门, 骡马80余匹

后 记

为贯彻邓小平同志和军委领导关于要保持老红军本色的指示精神，落实军区党委关于弘扬红军传统的要求，我们编辑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一书。

此书是在陆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党委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以红二十六军军事斗争活动为主线编印的。1993年8月，以《一一六师师史》为原本，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一书的编写工作。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认真听取红二十六军老首长的意见，按照198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28〕号和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103〕号文件精神，参照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刘志丹传》、《谢子长将军传》和王世泰《回忆我的红军生涯》等大量史料，由杨永华执笔，王军、魏玉斗、王荣赞编审，于1994年7月底完稿。

为写好《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战史》一书，集团军党委极为重视，罗友礼军长、李栋恒政委经常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张竭诚、石瑛、李兆书首长给予了及时指导，使编写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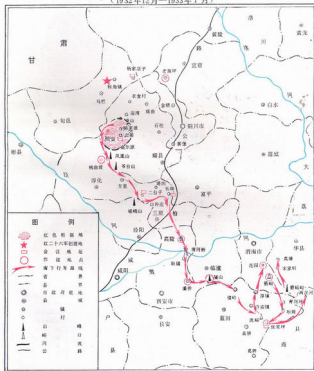
在编写过程中，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陕西省人大常委会、甘肃省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延安革命纪念馆、志丹县人大

常委会、一一六师师史办公室等单位提供了资料和图片。同时，韩肇文、徐宗望、王平、魏乃、黄庆武、段宗哲、刘郁采等同志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致衷心感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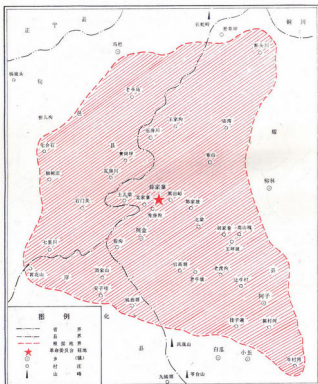
由于我们资料不足，水平有限，因而在编写当中难免出现疏漏和错误，恳请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在照金根据地活动及南下终南山行动路线图
(1932年12月—1933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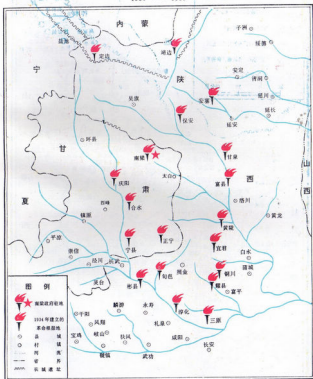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三年照金革命根据地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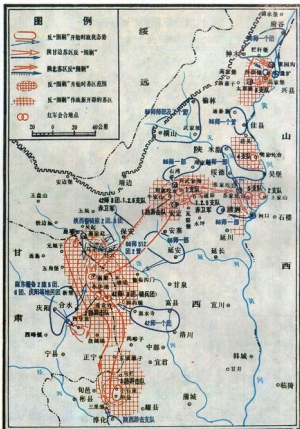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分布图

1930 — 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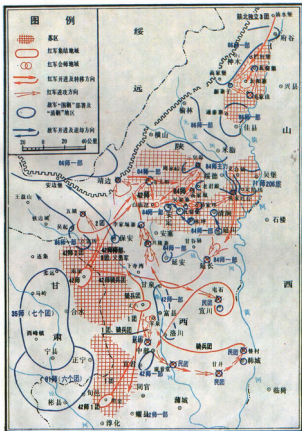
陕甘边、陕北苏区红军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4年2月—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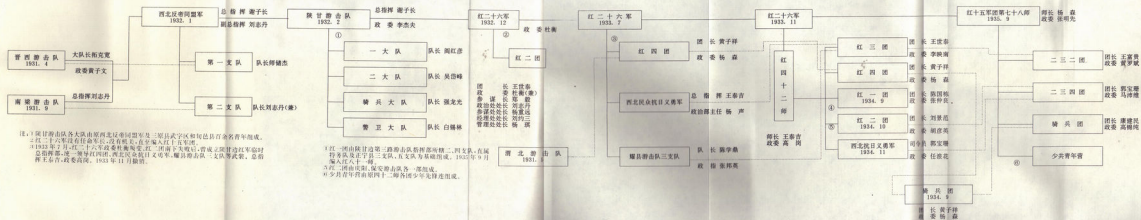


西北红军反“围剿”经过要图

(1935年2月—7月)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发展序列沿革表



注：① 渭北游击队各大队由原西北反帝同盟军三原县武字区和旬邑县百余名青年组成。
② 红二十六军没有任命军长，没有机关，直至编入红十五军团。
③ 1932年7月，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调离，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曾成立陕甘游击队临时总指挥部，统一领导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三支队等武装。总指挥王泰吉，政委高维。1933年11月撤消。

④ 红一四二师由原第三路游击队指挥部所辖二、四支队，在属特务队及正宁县三支队、五支队为基础组成。1932年9月编入红六十一师。
⑤ 红二团由庆阳、保安游击队各一部组成。
⑥ 少共青年营由原四十二师各连少年先锋队组成。